

蕭伯納在上海

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

魯迅序



蕭伯納與各記者合影

19 · 上海野草書屋印行 · 33

序 言

現在的所謂“人”，身體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後也多有了—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衆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像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裏偷瞥幾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着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聽，也怕聽。因為愛，所以圍攏來，因為怕，就特地給他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曰“諷刺”，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和穆杭了，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但這是英國的

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的人們却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裡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於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耳朵也不同起來了，批評也不同起來了。蹙脚願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塗了胭脂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家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於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於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係”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麼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色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裏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確鑿。

徐波流到北平，還給了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胡適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後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裏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

魯迅

蕭伯納在上海

目 錄：

寫在前面.....	1
一 Welcome.....	5
“不顧生命”	7
“祇求幽默”	41
二 匪黨的國際聯合戰線.....	61
三 政治的凹凸鏡.....	91
四 蕭伯納的真話.....	105
五 蕭伯納及其批評.....	113

467630

寫 在 前 面

——他並非西洋唐伯虎

蕭伯納在上海——不過半天多功夫。但是，滿城傳遍了蕭的“幽默”，“諷刺”，“名言”，“軼事”。彷彿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說真話，一定要傳做笑話。他正正經經的回答你的問題，却又說他“只會諷刺而已”。中國的低能兒們連笑話都不會自己說，定要裝點在唐伯虎徐文長之類的名人身上。而蕭的不幸，就是幾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這麼一個“戲台上的老頭兒”。

但是，真正歡迎他的，不是這些低能兒。事前的“歡迎者”，各自懷着鬼胎，大家都想他說幾句於自己有益而刺着別人的話。而事後一些“歡送者”，就大半瘟頭瘟腦——大失所望。“和平老翁”，變成了“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了。

可是，又捨不得他這個“老頭兒”，偏偏還要借重他。於是乎關於他的記載，就在中英俄日各報上，互相參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當做凹凸鏡，在他之中，

看一看自己的“偉大”而粗壯，歪曲而圓轉的影子；而事實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鏡，把蕭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搗搗得像一副臉譜似的：村的俏的樣樣俱備。

然而蕭的偉大並沒有受着損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現了原形。蕭伯納是個激進的文學家，戲劇家。他反對那些幹文字遊戲的虛偽“作家”，他把大人先生聖賢豪傑都剝掉了衣裝，赤裸裸的搬上舞臺。他從資產階級社會裏出來，而揭穿這個社會的內幕。他真正爲着光明奮鬥。他戰勝着自己身上的舊社會的玷辱和污點。他並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誤的“主義”和“思想”上，而昧着良心來詛咒新社會的產生。他只見到過“改良”，而事實却是“革命”，他沒有因此就惱羞成怒；相反的，他立刻向着“革命”開步走。於是乎那些賣人頭的，都噓噓的“歡送”他。

所以真正歡迎他的，只有中國的民衆，以及站在民衆方面的文藝界。中國的民衆並不當他是什麼“革命的領袖”，“完全的社會主義作家”，更不會當他是偶像。他們認識他現在是世界的和中國的被壓迫民衆的忠實朋友。

我們收集“蕭伯納在上海”的文件，並不要代表什麼全中國來對他“致敬”——“代表”全中國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漢文的當局機關

報；我們只不過要把蕭的真話，和歡迎真正的蕭或者歡迎西洋唐伯虎的蕭，以及借重或者歪曲這個“蕭伯虎”的種種文件，收羅一些在這裏，當做一面平面的鏡子，在這裏，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種人物自己的原形。

1933, 2, 22.

I Welcome

Welcome 伯納蕭！歡迎伯納蕭！

但是，上海歡迎蕭伯納，以及關於蕭伯納的文章太多了，擠在一起似乎不大舒暢。因此，我們決定把這一欄再分成上下兩半截。一時想不出適當的兩個標題。可巧申報的「春秋」上有這麼一段話：在此「不顧生命，祇求幽默」的潮流中，世界第一流幽默文學家蕭伯納老先生，居然抱着「溫和的傲態」，光臨「渠以為殊有興趣的中國政府治下的中國」。中國是否有什麼「不顧生命，祇求幽默」的潮流，倒還並未查考出來；不過這却便宜了編者——我們就機械地把這個「潮流」的尊號截成兩段：上半截叫做「不顧生命」，下半截叫做「祇求幽默」。

這種「割裂」完全是機械的，別無其他用意——特此申明。

“不顧生命”

歡迎蕭伯納

蕭伯納頌

誰的矛盾

迎蕭灰鼻記

蕭伯納和高爾斯華綏

介紹蕭伯納

說真話

關於蕭伯納

紳士階級的蜜蜂

“回去告訴你媽媽”

談蕭伯納

蕭伯納的幽默

飛遊長城

無文化無組織的民族的路

歡迎伯納蕭

李翼

何家幹

魯迅

洪深

郁達夫

郁達夫

張夢麟

玄

許傑

陽秋

林語堂

韜奮

慧珠

樸

林一

歡迎伯納蕭

李翼

英國文壇的老大家，伯納蕭已經來滬了，關於這位老戰士的來華，我們表示着萬分的歡迎。

蕭是生長在老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吉利，他已經有七十七歲的高齡，他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但是他絕對不像鄧南遮的歌頌着法西斯蒂的威力，他也不像高爾斯華綏一樣，對於時代乃至於政治的“冷淡”，自然，蕭過去曾經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但是當他目睹了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五年計劃的成功，以及全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刻，他就意識到未來的世界，是必然的屬於革命的建設和生產者，所以他從蘇聯回到英國時，回答專門發問“蘇聯壞到怎樣？”的新聞記者，是非常有力的兩句話：“我只看見好的地方，沒有去找壞處！”這兩句話，不但揭穿了大波立頓紳士們的污蔑蘇聯的謠言，同時更給關心着蘇聯情形的勞苦羣衆們，一個忠實的情報。

不但如此，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強佔了東三省，進攻上海，強佔榆關，這轟天的大砲聲，不但轟起了全中

國乃至于全世界勞苦大眾反帝的高潮；同時更轟動了這位老作家的心，他于是就到東方來實地觀察帝國主義的強暴，和反帝大眾的雄姿。在中國作家之羣，聽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榆關就不敢去北平，和北平的學生倉忙逃難的現在，這位老作家的精神，是何等的可佩？

不但如此，當這位老作家經過印度時，幾十位新聞記者包圍着問他對甘地和印度獨立的意見時：他的回答是，“絕食不是辦法，假使我碰到甘地時，一定叫他喫飯”，而對於印度獨立，是更有力的一句話，“印度隨便獨立好了”。這雖是有點幽默的氣分，但英帝國主義的最聰明的走狗(甘地)的裝腔做勢，已經打得粉碎了。

自然，這位老作家到現在為止，還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就文學上說就是同路人)，我們希望他能夠更進一步爲着最廣大的大眾奮鬥！

伯納蕭先生啊！高爾基在你的前面，你努力的追上！最少你也應該學到巴比塞，那樣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實際運動！我們希望着！

蕭伯納頌

何家幹

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的軍事行動會因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余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僅只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認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後的思想。但只就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

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爲革命家，明天汝就失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華民國，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偉大的。

此之所以爲蕭伯納！

——自由談，二月十八。

誰的矛盾？

魯迅

蕭並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口試——然而下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却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却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却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却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却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鴨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

是實行者，就會和牛關一同關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鬚髮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爲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爲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兒也。

——論語，十二說。

迎蕭灰鼻記

洪 深

釋 題

蕭是英國戲劇作者蕭伯納，迎是歡迎，鼻是我的鼻子，

灰是灰，灰鼻者，碰了一鼻子的灰也。

起 點

蕭先生是當代的一個重要作家，從他幼年時，站在十字街頭當衆演說，直到現在，不斷的寫小冊子，寫戲劇，批評攻擊現社會的種種不善，無時無刻不在為“社會主義”作宣傳，用他的生花妙筆為武器。雖然在他寫“每一個婦人應知的社會主義”那部書的時候，還有些偏於空想，見解不大正確，但是自從他到了俄國一次，長進得很多，居然科學化了。在種種意義上，都有一歡迎的價值。所以我很高興的做了中國戲劇及電影文化團體的代表，去請他喫飯演說，同時又答應替時事新報做一次臨時訪員，寫一篇談話。十六這一晚是整晚的沒有睡覺。

兩 點 鐘

英國皇后是不進黃浦來的。我特別努力，想搭了小火輪到大船上去。十六的下午向昌興輪船公司打聽了四次，小火輪幾時開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復，都不相同：兩點鐘，四點鐘，四點半鐘，六點鐘。我一聽此事有些神祕，我只得笨做，問了幾位報館朋友，兩點鐘就到新關碼頭呆等，兩點而三點而四點，在四點半鐘，公安局查驗護照的人來了，我跟定了他們，跟到了昌興公司。

不成行

昌興公司的主持人說，今天至少拒絕了二百個新聞記者，因為蕭老先生怕麻煩，所以一切閒雜人等，船長命令不許登舟。我想蠻幹一下，我說，“我上了小火輪，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國人說，“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推上岸是容易做到的，我想不必嘗試了，祇得將幾個團體托我請客的事，寫了一個小簡，託公司中人帶了去。這封信我相信他一定會看到的，我總算是幸不辱命了。

孫夫人

先前兩點至四點之間在新關碼頭散步觀潮的時候，發見一隻海關小輪升火，預備啟行，這又有點神祕。果然不久楊杏佛先生來了，不久孫夫人和她的秘書也來了。我再三和楊先生商量請他替我設個法，帶我去，費了多少唇舌，結果，船開往吳淞去了，我沒有去。

據說

據說蕭老先生不是怕別的，是怕人家把他當做新鮮物事看，如五腿馬三脚蛇之類。我想世界各處的人，這樣一視丰采為快，的確是不過一視丰采為快而已，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拒絕做小市民的欣賞物，蕭先生當然是應該的，所以我們不能怪他和輪船公司立下了約，公司應當保

護他，不讓一切想看熱鬧的人麻煩他。他那裏會曉得，在中國的民衆中，也有一部分人，想領受他一點指導，想聽他幾句公平的誠實的批評與證言，或者還能和他共鳴呢？

——時報，二月十八日。

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 郁達夫

我們正在預備着熱烈歡迎那位長臉預言家的蕭老的當中，却不幸又接到了去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高爾斯華綏的赴告。蕭今年七十六歲。高爾斯華綏今年六十五歲了。

照理說來，六十五歲，也並不算是天壽，但這位由法學家出身的英國上流社會的精密記錄者，若是不死的話，以後說不定總還有幾冊巨著出來，來報告我們以英國上流社會的動搖與變遷。高爾斯華綏在文學上的功績，不單是福些以脫家的史傳，與銀盒，鬪爭，正義，羣衆諸劇本，可垂不朽，就以他當一八九三年在南海旅行的途中，發見了海軍作家康拉特的一事業來說，也該在英文學史上占一席地位了。雖然是比較上流出身。但他那始終爲人道而立言，對社會下針砭的態度，就是在時代不同，潮流激轉的現在，我們也不得不加以十二分的尊敬。

反過來說蕭，他老先生對社會的態度就不同了。初聽聽似乎只在說玩而不當正經的死話，但閉目一想，或笑後心靈一轉，則立刻就可以發見這位長臉老人的嬉笑怒罵，那一句不是准對着社會激結的強心針？善哉，麥克開勃 (Joseph McCabe) 之言，他批評蕭說：“他並不說警句奇語，但他本身却是一句警句。是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最不利己的爲我主義的說教者，最潔己的十誠否定人，最嚴肅的幽默利世德。” (The gravest Humorist) 這不是很適當蕭的評語麼？

有一次有一位以美貌馳名歐美的女優曾對他說：“蕭先生，你若和我結了婚，生下一個小孩，相貌像我而頭腦像你，那這孩子豈不是世上最美麗最有思想的人了麼。”蕭說：“萬一相貌像了我，頭腦像了你，那還了得！”

諸如此類的妙語，在蕭的七十六年中間，不知發放了多少。曾記得他到俄國去參觀的時候，史太林也不得不認作馬克斯主義的後生小子，因爲他說，我研究馬克斯，是遠在列寧之先。當時歐洲各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宣傳蘇俄強制作工的違反人道，而蕭却對俄國人說：“我願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象發生，否則那些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那裏會有出路呢？”

在我們中國，幸喜還有一位魯迅先生——可以和蕭伯納對對。片語殺人，人家都在罵他是紹興師爺的故技，但蕭伯納總不至於是蕭山人罷？ 一九三三，二月一日。

——自由談，二月二日。

介紹蕭伯納

郁達夫

蕭伯納的名字叫作 George Bernard Shaw, 簡作 G. B. S. 和司司替文孫的 R. L. S. 三個頭字一樣的為大家所知道。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生於南愛爾蘭之杜伯林 (Dublin) 市，一八七六年隨母至倫敦。是一位很漂亮的雜文記者，不守舊例不循規矩的批評家。後為費邊協會會員，成了非正統的社會主義者。先寫小說，最著名的為“開舍爾·貝倫”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及“藝術家間之愛”與“非社會的社會主義者”等。初受美國亨利·喬其的學說影響，後轉入於馬克斯主義。以戲劇為他的宣傳武器，作成劇本至數十種之多。最著名的，有“武器與人”“人及超人”“華倫夫人的職業”“聖喬安”等等。散文集之有名的，為戲劇論集，伊孛生主義，樂聖華格阜等的宣述，以及為有產階級男女說社會主義的著作等等。

平生愛聽音樂，愛看戲劇，愛說死話。連對他自己的父親的批評，都喜歡以死話出之。他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無能的，不成功的人，在主義上他是一位熱烈的禁酒主義者，但在實際上却是常在偷偷喝酒的醉漢。”又最愛和人抬槓子打仗，譬如當一位德國猶太人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在擺起新人的面孔，大說近代藝術的墮落的時候，他老就會一反素來的習慣，出來說最守舊的妙語。到了他古稀的誕辰，英國各報，當然都登他的照相，爭呈頌譽，他老人家却忿忿地說：“我早晨起來，一見了這許多報上的我自己的照相，倒以為我是死了。”

在英文裏有一個新字，叫作 Shavian，後面加上一個ism或ist上去，就是屬於這的主義及主義者。字典上去翻翻，或者會翻不到，怕要譯作剃頭主義或整容主義者，但其實却是指蕭老的崇拜及模仿者而言，猶左拉之於 Zolaism也。關於蕭的評傳之類，英美出得很多，似以 Frank Harris 和 Archbald Henderson 的兩本為最好。

我們對於蕭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國說出我們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侵後的幽默，與國聯對於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沒有什麼。

說真話

張夢麟

人家都知蕭伯納是丑角，說他善於說笑話。蕭伯納說“我說的是真話，世間最大的笑話，便是說真話”。

說真話！——這便是蕭老先生五十年來大聲疾呼的口號。他的論文，他的小說，他的劇作，都是以這個使命為中心。幾十年來，他不憚煩地把那些說假話來遮蓋自己的行動的英雄，說假話的中產階級，說假話的普羅列達里亞，說假話的女人，說假話的政府等等捐給我們看。把他們言行不一致的滑稽暴露出來，叫我們看看這便是近代文明。

愈是自私自利的人，愈是說得出正大堂皇的理由。愈是貪贓枉法的官吏，愈是會說保障人權；愈是會享樂的摩登男女，愈是說得出跳舞救國等等，等等。於是我們就常在報章上看見許多言論，勸這些人照着所說的話去做。蕭伯納說，這便是理想主義者——不敢直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言行不一致的人，是因為他不敢直面所行的真實理由，所以想了一個假的，正大堂皇的理由來代替。同樣，這些勸他們照着所說去做的人，也是在遮掩現實，理想地以為人類果能如所說的那樣高尚地去行動。現實主義者，就知

道全不是這回事。人們還在進化的過程中，還不能完全，這些嘴上所說的高尚道德，還談不到。所以人類的自私自利，貪婪享樂，當然是意中事。可是我們如果能直面這個現實，還可以想出改善的辦法，人還是不斷地向前進化的。所以蕭伯訥的主張，便是人怎樣行動都行，照着你的本能去做，可是不要做的是一樣，想的又是一樣！——說真話——他要求我們的，不是要我們行如我們的言，是要我們言如我們的行。這一點，蕭伯訥又把我們的因襲思想，給顛倒過來了。他常常玩這個把戲。

那麼，照蕭伯訥的主張，豈不是善惡都不分了嗎？蕭老先生，就在 Major Babrara 中回答這個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善惡！你以為你活了十多歲，起碼可以辨別善惡嗎？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自孔子蘇格拉底以來，幾千年中，絞了無數上智者的腦血，還在爭論不出一個結果呢。你以為你就懂了嗎？”

所以人們只有照着本能所命地做去。直面你為什麼這樣做的動機。到了你本能地覺到這種行為不對的時候，你就會想法子改了。假使你只會用口實來遮蓋着這現實的話，你一世也改不了，便是你一世也進化不成再高等的動物。那末，就有比你更高等的動物（蕭老先生所謂超人），出現

了來，拿你對待猴子的手段，來對待你了。

蕭伯訥說人類不錯是現在最高等的動物。可是生物的進化，並不是到人類即止，因而人類非保存不可，並沒有理由。你對待其他下等動物的手段，爲什麼比你更高的動物，不能拿來對待你呢？

據說一兩年前曾有一位大雜誌的編輯先生，不遠千里，跑來問老先生一個問題，在他以爲這個問題的蕭伯訥式回答，一定使世人感覺很大的興味。他的問題是在蕭伯訥的意中，現代誰是最寶貴的，是文化，進步最不可缺的人。他問：“假使人類突然遭了全滅的運命，而你老先生，就如創世紀中所載的 Noah 一樣，可以有力，留一點人種，那末你留那一個人呢？”

蕭老先生帶着謎似的微笑答道：

“我一個也不留。”

蕭伯訥對於現代人類，非常悲觀，可是對於生物進化，抱有極大的希望。

現在他到中國來了，不幸而正當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我們的時候，這個使我們想起他在歐戰時的態度來，在那個時候，英國有人說他，“協約國一面和德國打仗，一面和蕭伯訥打仗。”全英國人民都在痛詆德人的時候，他却

出人意外，大罵起英國政府來。若是在中國的話，早被鎗決了。

當時他的態度，可以在戲曲“傷心之室”中看出。戰爭是近代文明的結果。受近代文明影響的，不只是這一國，而沒有那一國，不只是這一階級，而沒有那一階級，近代文明所墮落的，是全人類。所以德國人固然該罵，英國人更該罵。全英國人民在罵別人的時候就忘記了自己，因此，蕭老先生只好出來說真話了。

第二次大戰又要展開了。也許蕭老先生還要說一次真話！

——自由談，二月二十。

關於蕭伯納

玄

蕭伯納在“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文中論易卜生道：人們盲目地堅持着一些不正確的概念（關於宗教的，政治的，兩性關係的），並且讓這些概念左右他們的行動，雖則他們心裏不願；而易卜生的諷刺就是針對了此種矛盾狀態。

我們以為蕭伯納也就和易卜生相像。蕭的重要著作都

是揭發人們傳統觀念的錯誤（而這些錯誤的觀念又是統治者用種種手段來維持的），可是蕭比易卜生更深刻。例如對於傳統的錯誤的“義務”觀念，蕭說道：文明人常用義務這一名詞來掩飾他的行為的真正面目。在“*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中，蕭借了拿破崙的嘴說：“英國人做事總要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心裏要什麼東西了，嘴裏決不肯說他要。……當他要替曼徹斯脫的工業製造品找一個新市場的時候，他先派些牧師出去宣揚和平的福音。然而土人們傷害了牧師了，於是英國人立刻跳起來拿槍保護基督教；為基督教而戰爭，而征略，而且謝謝天賜，佔領了那新市場。”在“*Candida*”和“*Widower's Houses*”等劇中，蕭嘲笑那些嘴上掛著“盡義務”的招牌，而無往不想自私自利的偽善者，真是一字一鞭。

在以拿破崙為主角的“*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以羅馬大將凱撒為主角的“*Caesar and Cleopatra*”一劇中，蕭嘲笑着世人的“英雄崇拜”。在蕭的筆下，“英雄”這東西是非常蠢笨的自私自利者。

同時這兩篇歷史劇又是“非戰的”。可是蕭的「非戰」劇本還當以“*Arms and the Man*”及“*Major Barbara*”為最主要。前者揭發帝國主義國家的兵士對於戰爭的心理，

“這是怕死，所以斃殺！”後者揭發不但大砲機關鎗魚雷等等是殺人的利器，而“愛國”，“宗教”，“公道”，“義務”，等等好聽的名詞也是殺人的利器。

許多人認爲“Man and Superman”一劇中間有蕭的“哲學”，故其價值，乃在其他諸劇之上。誠然，“人及超人”除嘲笑世人的戀愛觀而外，又提出了“哲學”；——我們人不過是一種實驗品，是介於獸和超人之間的一個環，而戀愛呢，則爲大自然達到目的（到超人）的一種手段罷了。戀愛是一種偉大的“宇宙力 Cosmic Force”。蕭在“人及超人”的前面寫了數萬言的長序，以說明他這哲學。喜歡拿戀愛來當作“哲學”研究的人們很可以讀那劇本和那長序。但是也不要太高興。因爲你若把“人及超人”讀了兩遍，你又要覺到蕭老先生或者在那裏嘲笑那些“戀愛哲學家”。

從“五四”以來，我們文壇上常常提到蕭的大名。蕭的著作，也很有幾本譯成中文了。然而對於蕭的研究，還是很少。趁現在這當兒，如果認真把蕭來研究，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罷？

紳士階級的蜜蜂

許傑

蕭伯納是英國紳士社會的一隻蜜蜂，他有刺，他也會釀蜜；不過，他所釀的蜜，却是甜中帶酸的。

英國的紳士是不只一個的；因此，當這個蜜蜂無情的去叮一紳士時，另外的紳士們，以為這並沒有叮到他們，於是乎，他們笑了；同時，被他人笑為被蜜蜂叮了的紳士，也發現那幾位笑他的紳士被這討厭的蜜蜂叮了一口了，於是他也笑了。

但英國的社會，除了一大批的紳士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們，是沒有被列入紳士之林的資格的。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這一批紳士們，好像都患有潔癖一樣，禮服穿得筆挺的，領口，袖口，胸口，都是燙得筆挺的白色的硬領，白色的袖口，白色的襯衫。有一點骯髒的東西，他們連豎起兩個指頭去撮一撮都不高興的。這是何等看不過去的事！現在，他們却親眼看見，這一個蜜蜂，嗡嗡的鑽入紳士們的領口，袖口，以及胸口裏去放刺，使得這一批紳士們沒有辦法，使得他們演了許多引人發笑的怪劇；於是乎，這一批非紳士階級的人們，也看得笑了。

這大概便是蕭伯納之所以爲蕭伯納吧。

——自由談，二月十九。

回去告訴你媽媽

陽 秋

蕭伯納在香港時，對路透訪員說：“中國報界中人何以無一訪余者，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余乎？”這兩句話真熱辣辣地很有點令我們難受！可是我們的蕭先生也許忘記了他前年在蘇聯時一個小姑娘所給予他的教訓罷。故事是這樣的：

蕭伯納前年在蘇聯時，有一天，同着一個叫做×××的小姑娘玩了很久，分別的時候，蕭對她說：“你回去告訴你媽媽，今天同你玩的就是世界有名的 George Bernard Shaw。”可是這位小姑娘畢竟是太“幼稚”了，她竟不識蕭爲何許人，立刻毫不遲疑的仿照蕭的口氣對蕭說：“你也回去告訴你媽媽，說今天同你玩的就是×××姑娘！”

蕭這故事還沒曾忘記罷！

——自由談，二月十九。

談蕭伯納

林語堂

一 蕭伯納的傳記

最近有兩本蕭伯納的傳記出版，一本是亨德生(Archibald Henderson)所作。亨德生是蕭伯納所稱為十九世紀後沒人知道的美國北加羅來那省大學的一位教授；該大學幸虧有一位研究蕭伯納的亨德生，也許藉此可揚名於後世。亨德生是蕭氏的老友，這本書是特得蕭的許可而作的，是唯一 Authorized 的蕭傳。全書八百餘頁，蕭之一生著作，思想，行述，家世，及關於他的笑談軼事都搜羅收入了。但是我到底喜歡赫理斯(Frank Harris)所作的傳，而不喜歡亨傳。理由很簡單，赫理斯是個文人，天才作家，而亨德生却是規規矩矩的編撰人而已。所以赫理斯的文，讀來津津有味，有骨氣，有風味，有諧謔，有深思，有警語，有觀感，而亨傳却只會作發而皆中節的爛調，說不偏不倚的公道話而已；比之通常評傳固無愧，比之赫傳就多遜色了。而且赫傳篇幅只亨傳的一半，讀來反而覺得極親切逼真的蕭伯納印象。

赫傳勝於亨傳還有一層理由，就是兩位作傳的人對書

中主人翁態度之不同。亨德生雖然也保持“學者面具”，主持公道，批評蕭伯納，但是到底他是蕭伯納的崇拜者；蕭伯納在赫傳的跋中稱亨傳爲巨著“Monumental biography”，尤其使我們懷疑。因爲學者雖然也是忠實，到底不大肯說由衷之言。赫理斯只是文學界的叛徒，他雖不標榜公道，寫出來的却字字是心聲。他不是蕭的崇拜者，他是蕭的畏友，要挖苦就挖苦，要嘲弄就嘲弄，所以他畫來的一副神像，反而逼肖。我主張凡讀書人，要研究任何學術上的題目，必先從反對批評的書看起，再看正面的書——研究蔣介石的人，應先看看改組派前幾年的文章，再看一年來改組派的文章。如此思想才不會冬烘。

二 蕭伯納的法螺

赫傳態度之長處，可由以下數段證明。赫理斯挖苦蕭伯納，說蕭一面表示痛恨美國，一面却全盤抄襲美國的廣告法。

“伯納蕭最初的宣傳也不過是通常的方法。從頭他就喊着，‘給我大車與喇叭’，現在大車與喇叭不通行了，他又喊着‘給我無線電與銀幕。’在他少時與人辯論時，他懂得附庸風雅，使大家心目中將他與某名人之名聯絡起來。我記得一次在他與海恩門辯論時，他站起來說，‘馬

克斯主義已經像死羊肉了。殺死他的是我蕭伯納。’”

於是赫理斯便有以下一段挖苦的妙文：“他(蕭)最先認識有聲電影的宣傳用途……在這一點，他一生演講的訓練，使他極佔便宜。他模擬莫梭利尼(譯者按：這電影我親眼看過)，甚至模擬蕭伯納自身，從此可證明他是極偉大的表演家，就是假冒的極端；然而似乎在他中年作戲劇時所搖旗吶喊反抗的就是假冒。他甚至能批評他扮演手段的高下，而從有聲電影看見他年已將老了，嘴脣也已漸不像樣了。從此他便改用無線電，這無線電可將他的聲音遠播全球而不引起他個人曲線美的問題。”

讀過英雄與美人(Oaesar and Oleopatra)一劇的序言的人，都記得蕭伯納曾提出一問題：Behr then Shakespeare? (蕭伯納是否比莎士比亞好?)在一八九六年，蕭氏寫一篇莎士比亞的劇評(那時倫敦 Lyceum 戲院正在扮演(Oymbiline)，他說：“除了荷馬以外，古來沒有一個有名的作家，連司各脫在內，像莎士比亞被我這樣看不起，當我自己的頭腦與他的頭腦比較一下之時，我對於他不耐煩的程度，有時使我覺得不如爽性挖起他的屍身對他投石，因為我明白知道莎士比亞及崇拜他的一班人所能懂得的，只有這一類的看得的侮辱。”

但是記得蕭伯納又在那裏說過，“他是世界上最沒有得充分登廣告的人。”這便是蕭氏法螺之一斑。

三 蕭伯納論耶穌

據蕭伯納言(安得羅克利思與獅子序言)，耶穌是革命的理想家，是共產公妻論之始祖。享傳說據蕭的意見，世界愈進步，愈證明耶穌道理之偉大。據蕭氏的解釋，耶穌的教訓，概要有四條，第二條是：

“廢除產業，併入公家。你的工作應全脫離酬勞關係。如果你讓一小孩挨餓，便是讓上帝挨餓。撇開一切關於明天衣食的計慮，因你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與財神。”

第四條是：

“廢除你家庭的牽累。凡天下的母親都像是生你的母親。天下的人都像是與你同胞的兄弟。不要為喪事費你的光陰；注意生，不要注意死；海裏的魚跟灘上的魚一樣好，並且更好。天國是在你的內心，而在天國裏，是沒有嫁娶的，因為你一生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及你所嫁或娶的人。”

但是對於耶穌個人做基督，自稱上帝之子，能復活升天等傳說，蕭伯納是絕對排斥的。尤所奇的，就是他不相信耶穌的性格是溫良的。慈愛的，人道的，悲壯的，哲學的，都可以說，但不能說他是溫良。蕭氏說：

“稱耶穌爲溫良，謙虛而柔弱，這是卑鄙的近代的假託，在福音書中，毫無根據。”

其實東西偉人的人格，都被小人誤認。就是我們的孔子何嘗是溫良恭儉讓？貌似陽虎，何嘗溫？一方墮費，一方欲往見以費叛的公山弗擾，又驅蒲人不適衛而出圍，出圍後適衛而主張伐蒲，何嘗良？不見孺悲便罷，又必取瑟而歌，與人難堪，何嘗恭？狐貉之厚以居，什麼也不食，什麼也不食，何嘗儉？不肯賣車葬顏回，何嘗讓？所以我們只好學孟子說：“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我們若肯不帶眼鏡去重讀論語，孔子的人格自會活躍紙上。

——自由談，二月十八至二十。

蕭伯納的幽默 韜 奮

英國的當代文豪蕭伯納氏 George Bernard Shaw 最近環遊世界，聽說可於這幾天到上海，大概記者這篇短文和讀者諸友見面的時候，這位白髮皓髯精神矍鑠的蕭老先生已到了中國。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有聲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發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矛盾腐敗黑暗，在我國所謂“有力量的人”尙徬徨於歧途中的時候，這位老

先生到中國來走走，我們當然尤其表示歡迎。他今年七十七歲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齡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當益壯”，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國人裏面年未老而先現出一副老腔老樣的“待亡人”，這也是我們對於他可以表示歡迎的一點。（蕭氏的許多戲劇的名著都是在四十歲以後作的，其中有一半是在五十歲以後作的，他的尤其偉大的三種劇本“*Heartbreak House*”，“*Back to Methuselah*”，“*Saint Joan*”都是在六十歲以後作的。）除了這兩點外，他的爲人，他的演講，他的著作，最令人不忘的，就是在他那縱橫的機智和辛辣的譏諷中尤富於令人失笑令人絕倒的幽默意味。但是他並非一味替“笑林廣記”增加材料，所以他有一次聽見人說“這個有趣的脚色不過說說笑話罷了”，他欣然的回答道：“不錯，我是說說笑話。不過我說笑話的方法是要說出真實來。這纔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話。”（見 Henderson 所著“*Contemporary Immortals*”）他最近途經香港，對路透社訪員就說了一大篇“笑話”，訪員問他要不要飛遊長城，他說：“我以為沒有趣味的事情莫甚於此，長城於中國有什麼用呢？”他並用冷諷的態度盛讚日本不向中國宣戰一點最得體，因為說宣戰確未宣戰，一面仍得積極侵略！這些話在我國人聽了當然痛心，

但却都是“真實”。

講到蕭氏青年時的奮鬥生涯，却不甚幽默。他的老子一貧如洗，蕭氏早孤，全恃寡母撫養成人，十五歲就棄學就商，廿歲到倫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裏替人記帳簿，鈔鈔貨單，所以他後來說笑話，說他的“較早的作品”是在帳簿和貨單裏面！但他同時却無時不在那裏夢想要作一種小說。於是在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氣大膽的寫他的第一種小說。他作完之後，即名為“未成熟”，但是賣不出，從來沒有出版過。他不為膽怯，又在紙的反面作第二種小說，名“無理性的結”，但是他當時的著作，各出版家連看都不要看！可是他絲毫不為膽怯，又繼續作了三種小說。蕭氏自己後來說起這五種最初作品的時候，他說：“我總記得最初的五種作品是幾包很重的黃包紙，常常由出版家陸續寄還我……我總記得當時要想把寄回來的稿子再寄與其他的出版家去試試看，六辨士的寄費就很費一番籌措的工夫。”這種情形，在事後追想，在我們旁人聽來，固然是頗饒“幽默”，可在當時的蕭氏未必覺得有什麼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氣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克服困難，却仍靠他的幽默的精神。

飛游長城

慧珠

“飛游長城”，是一種多麼壯的快事！

蕭伯納在離開英國以前曾經說過：“赴華後，將飛游長城。”

但是爲預料所不及！一月三日榆關失守，關山淪陷！渴望的東方歷史文化上偉大壯觀的天下第一關，第一關的匾額，却已經送到東京去陳列！

“事與願違！”失望之至！不敢再作豪想！

事實遠乎在逆料之外！一夜間瀋陽陷落，一月間敗退錦州；榆關失守，平津已朝不保夕！或者因“戰略關係”會退守到黃河以南！

但是既到了東方，多少總有一線希望，“不願華北戰事阻我行也，”姑且游一趟北平，瞻仰瞻仰東方的文化城！

公宴歡迎，似乎還有一個請他演說的交換條件，——“以導游長城爲報。”聰敏之至，倒是投其所好的。祇惜這話說得不是時候。

日本人已明明佔據了山海關！九門口還是一部份忠勇兵士効死的疆場！雖則說長城既稱爲萬里，正不必計較着

檢閱的一隅！

事實成了幻想，遺憾與失望能使蕭伯納氏多添一種新感想：“長城於中國有何用乎？”

——申報「春秋」，二月十八。

“無文化無組織”的民族出路 樸

英國在今日有兩位聞名全球的學者，一位就是轟動一時前夜方離滬的七十七歲老翁蕭伯納氏；另一位就是十二年前曾來華講過學的哲學家羅素先生。我們知道他倆均以觀察深刻名於世，羅素氏於游華後曾發表類多關於揄揚中國古代文化的文字，輯有專冊，銷路頗廣。可惜此次這位蕭老頭兒到中國的時間太短，而經過的地方，又大都為香港，上海（連上海的南北市區及鄉間農村都沒有看到）等歐化的所在，於是有人以為很難希望他能給我們什麼深刻的批評：但是有兩點是他老人家不要經過觀察而早已預聞的——現在更身臨其地，尤其是看到香港，上海的一班文人學者以及路上熙熙攘攘的商販，苦力所表現的。第一點就是中國目前“苦無文化之可言”，據昨日本報記者所發表的蕭氏談話中有這樣幾句批評中國的話：“按文化一義，

如照科學解釋，即爲凡一切人類行爲之可以增進人類幸福者，尤其是對於大自然之控制，在中國除田鄉間尙可尋求其少許文化外，此外殊無文化之可言。中國今日乃向西歐取許多已經失其效用遺害大衆之所謂‘文化’，如議會制度，教育方法等等，有何益處。”我們對於這種批評要進一步說明的就是蕭氏之所謂“中國無文化之可言”應作爲“中國之舊文化日就湮沒，而新文化尙未興起”的意思來解釋，就沒有語病了。因爲蕭氏並未見中國農村的真面目，他沒有嘗到一點兒中國文化的味道，他所批評的，僅爲他的一種智慧的想像罷了。但是他這種想像的批評，與他的朋友羅素所揄揚的出發點，並不衝突，因爲羅氏遍游內地，對於吾國農村風俗，內地習尚，均有相當的考察與探討，他所分析的對象，就是以蕭氏所想像的“田鄉間”爲根據的。不過現在時隔十數年，我們國家的景況，可說是一年壞一年，而農村經濟的崩潰，尤爲顯著的事實，這也許是羅素先生所不及料的了。

第二點，蕭氏所知道的，就是中國民衆的無組織，因此他對香港學生的勸勉，是叫他們要有組織有計劃的去革命，日前他在上海的言論中，亦以此義爲發揮的重心。

我們總觀昨日蕭氏所發表的意見，在表面上對於這無

文化無組織的民族出路問題，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但實際上固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而具體的暗示了。他說中國撥取已經失去效用遺害大眾的西歐文化，那就是說中國要謀民族的出路，應根據自己“田鄉間少許可尋的文化”重新發揚光大！本着科學的文化定義，共向增進人類幸福的大道努力前進，他說改造現狀的革命方法，是要有組織有計劃的奮鬥，方有成效。

我們看到目前這種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景象，我們若不願做“待亡人”而仍有自救決心的，則對於這過路的老朋友所給我們的暗示，就應當表示誠意的接受，一致向着這“創造新的文化”，“組織起來自救”的兩條大道猛進。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可沒有我們猶豫和觀望的時候了。

——申報業餘週刊，二月廿日。

歡迎蕭伯納！ 林 一

在去年的美國新羣衆(New Masses)雜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張漫畫，從蘇聯回國後的伯納蕭，手抵住了歐美資本家的紅鼻子，一手遙遙的指着在成功行程中的蘇聯

五年計劃的建設。當新聞記者們圍住了伯納蕭問蘇聯有什麼缺點的時候，蕭說：

“蘇聯當然還殘留着一些缺點，但是我跑到人家國裏去，不是去找缺點，是找優點去的；如果我要找缺點，在我們這兒，跨出大門，就滿眼都是，何必老遠的跑到蘇聯去呢！”

是這樣的一位伯納蕭，現在却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忽然動了壯遊的老興，搭船到遠東來了。據最近的電訊，說在本月的十七號，他可以到上海了。

歡喜“幽默”的中國人，對於這位幽默大家的到來，當然會有一番熱鬧的歡迎。聽說南京方面，已經由朱家驊羅家倫等領銜打電報去歡迎他了，定然還有不少的幽默家，想戴外國招牌賣道地國貨的。像過去歡迎杜威，歡迎秦戈爾那樣的作一下大廣告。但是把伯納蕭硬拉做百家姓上的同宗的這些高等華人，真會懂得伯納蕭，或是使伯納蕭懂得一些真正的中國麼？這委實是一個疑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狂熱了歐美一切高等人物的時候，伯納蕭很不客氣在那些戰爭英雄的鼻子上，塗上了白粉，敢然地反對強盜分贓的大戰。最近蘇聯向世界學者名流質問下一次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中將抱什麼態度？伯納蕭回

答得很有趣，他說：

“等他們打蘇聯的時候，我早就被吊起來了。”

這是多嚴肅的一個“幽默”的回答。現在，正是這個大戰迫在眉睫的瞬間，日帝國主義的“英雄”們，正在很勇敢的向中國大眾揭開了大戰的血幕，太平洋的風雲一天緊似一天，不知在今朝還是明天，這個強盜們的分贓大戰，立刻就會爆發。在這時候的伯納蕭的遠東之游，尤其是他這次的漫游之前，親口對印度的民衆說：

“英國是應該放棄印度的！”

可見他的確是看見了些什麼，準備被人家“吊起來”的。可是我們歡迎他將使他看見些怎樣的中國呢？

自然，舊的中國是崩潰太怕人了，但是新的未來的中國，也在這許多災難當中誕生了。我們希望伯納蕭，能够健在，再一次扭住帝國主義的大鼻，叫他們看看這新的成長着的孩子！

而且我們敢這樣的相信，伯納蕭的確是這樣帶着希望的心情來的！

哈囉，伯納蕭！咱們是這樣歡迎你的！

“祇求幽默”

- | | |
|---------------------|-----|
| 一半兒恨他一半兒愛 | 許嘯天 |
| 關於蕭伯納 | 廢名 |
| 口占一絕 | |
| 五十分鐘和伯納蕭在一起 | 張若谷 |
| 最新儒林外史平話 | |
| 馬相伯老人之答問 | |
| 翁照垣將軍致蕭伯納書 | |
| 讀飛機募捐啓有感 | |
| 東西戲劇家兩權威晤談——梅蘭芳和蕭伯納 | |
| 兩雄吟 | |
| 蕭伯納論 | 張資平 |
| 義務廣告 | |

一半兒恨他一半兒愛 許嘯天

“……我們紅葉會同志……也是“矮子吃屁”式的跟在人後頭後面趕着印出一張專號來，而我的寫這幾句，更是吃屁中之屁。

提起伯納蕭，叫我一半兒恨他又一半兒愛他！這位寶貝，在戲劇上的態度，我可以在他自己寫的一個劇本“鰥夫的家庭”裏特倫池所說的一段道白爲代表。特倫池一方面反對殘酷的資本家，而一方面又捨不下其資本家女兒迷人的勁兒；他迷糊了！他彷徨了！便說出一句不澈底的話來道：“我願娶你的女兒；可不要你從不道德攫奪得來的財產，一絲一毫也不要！”要女兒不要財產，行嗎？……果然他終於不澈底的娶了資本家的女兒，又接受了他的財產。

如今我們這位蕭先生，他一方面也參與所謂社會主義運動；一方面又去接受諾貝爾的獎金，這還不像那特倫池的一句話嗎？

“你的女兒，我是要的；你的錢，我可不要。”

如今我們的蕭先生聽說是轉變過來了！我實在愛蕭先

生！我同時又實在恨蕭先生！蕭先生天才的偉大，以及他理想的清晰，縱橫馳騁，無所不利。他是戲劇家，是政治家，是社會學家；同時又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劍。我希望蕭先生這一次的轉變，把他的劍柄移轉過來，移轉在民衆手裏——蕭先生！快來歸我們！”

——紅葉第一二二期。

註：——許嘯天先生也注意到了“蕭的這一次轉變”，要他『移轉在民衆手裏』。許嘯天先生說：“蕭先生，快來歸我們！”這“我們”是誰？是民衆？許嘯天和民衆——倒是一個新題目。這當然很好，也許許先生也要“轉變”了。

但是“接受諾貝爾的獎金”是又恨，而“參與所謂社會主義運動”是可愛，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不懂。這裏的邏輯，似乎和大晚報罵的“坐在安樂椅裏又要談共產主義”是一樣的。對於左傾作家的這種責備或者謾罵，都是跳不出一種市儈邏輯。不管是好意或者惡意，這裏論調其實有點兒滑稽。

蕭接到諾貝爾獎金歸他所得的消息的時候，

他說，他們把這獎金給我，是獎勵我這一年沒寫什麼東西——沒有開口。他拒絕了接受這筆款子，而把這八千金鎊捐給了瑞典的窮苦作家。他還說過：“進益不平均，社會就永遠得不到安靜”，假使有一位千萬的富翁，把資產分送盡了，那麼，社會還是一樣，並且更多了一個窮人。他覺得不是根本的改革，浮面的救濟是無用的。

如果許嘯天先生所了解的“快來歸我們”的意思，只是要使社會上“多一個窮人”，那麼，從他的“吃屁中之屁”起，直到“快來歸我們”而止——這整篇文章都只是滑稽或者“幽默”，再也沒有什麼別的。廉價的“幽默”和糊塗的推論，似乎也是一種病症。

關於蕭伯訥 廢名

“——以流淚的歡笑來獻給這位大文豪啊——

在國人熟知的譯成中國姓名的世界大文豪中，恐怕要算高爾基和蕭伯訥兩位老先生最享盛名吧。

Bernard Shaw 不譯成“伯訥蕭”，而譯作“蕭伯訥”，

有人以為是由於譯名者百家姓讀得太熟的緣故，其實這倒不如說是譯名者的一番苦心，因為第一，“蕭伯訥”讀起來比“伯訥蕭”來得順口，第二，這位大文豪是一個帶着濃厚的中國風味的諷刺大家，除了口音與服裝飲食之外，他的一言一行都不類乎機械化的歐洲人，而倒酷肖滑稽化的東方人。“蕭伯訥”的譯名正是這位老先生的生活與個性接近東方風味的象徵。

現在我們景仰的大文豪不遠萬里而來到中國了，他帶來的，不是毒殺我們的鴉片槍砲，而是深沉的反抗現世黑暗的幽默情調。貧乏的我們應當用什麼獻給老先生呢？我想沒有別的，只有環繞着他的無邊的流淚的歡笑吧！

是的，蕭伯納是一位幽默的社會主義家。他為了要猜一猜社會主義的神祕之謎，曾經不顧一切訪問蘇聯，他的親友唯恐他給“赤色的惡魔”餓死凍死了，替他預備了大量的麵包和行帳，但他拒絕了這些餽贈，終於由恐慌的洪水世界進到了另外一個新的天地。在盛大的歡迎聲中，這位大文豪目擊耳聞了一切，才恍然悟到無聊的誣蔑造謠是足以蕪塞世人的聰明的。於是在他回國後，他將在蘇聯所得的印象照實寫出來了。

中國是一向在侵略的強盜們的肆意侮辱誣謗中過日子

的一個可憐民族。“野蠻民族”，“未開化的國家”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加給我們的惡名。現在我們的大文豪也要不顧一切地來訪問一下中國，看看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民族，看看所謂“文明人”在中國幹的一些什麼勾當。

可惜蕭伯訥先生和他的夫人來上海的時候，正是冬寒乍退的初春，如果是在萬樹落葉的秋天，我倒可以用一句唐詩來歡迎他們了：

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註）

註：在那深秋萬樹落葉無邊的當兒，我們的蕭先生和蕭夫人，笑容可掬地下了英后輪船，踏上了中國的境地，而滾滾的長江在與歡迎者盛大的歡笑聲相應和？”

——申報“春秋”，二月十八日。

〔 〃 〃 〃 〕

〔“補白”〕

海上寓公某，閱大晚報“蕭伯訥應散盡家財”之論，恍然若有所悟，即用小報稱蕭伯訥謂“包條銷”之新古典，口占一絕云：

長江滾滾 <u>蕭蕭</u>	為恐家財一旦消
去後是非誰管得	滿街聽唱包條銷

五十分鐘和

伯納蕭在一起

張若谷

我們的汽車，才停在莫利愛路故孫總理住宅的門前，看見一個穿灰色大衣的外國老頭兒，白髮，白鬚，高鼻子，粗眉毛，小眼睛，從門口踱出來。預先候在門外的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們頓時把他包圍起來。洪深充作臨時翻譯，對記者們說：“三點鐘請諸位派代表再來，伯納蕭先生預備接見新聞記者，以六人為限。”

伯納蕭鑽到宋子文的私人汽車裏，我們的汽車，緊緊跟在後面，在霞飛路上疾馳，一直向福開森路世界學院開去。我看時錶，是兩點三十五分。

在世界學院一間精緻的小廳裏，已經有十幾位男女在那裏恭候。大半都是世界筆會中國支會的會員，有戴眼鏡穿馬褂的蔡元培，圓圓面孔靜如好女子般的梅蘭芳，鬚鬚像刺蝟般的魯迅，還有葉公綽，楊杏佛，林語堂，張歆海，謝壽康，邵洵美以及其他與政治文藝都有關係的名媛與要人。

洪深真是一個熱心的導演，他忙着要把這一羣的男女臨時支配成一個舞台場面，他請蕭老頭兒坐下來，但是這

一個可愛的老頭兒，不知是要學習中國禮貌呢還是要表現他的不老的精神，仍舊像一尊石像般兀立在中間，大衣也不脫卸，便和來賓一握手行接見禮。

不懂中國話的伯納蕭先生，和不會說英國話的梅蘭芳，彼此相見了。蕭老頭兒開頭第一句，並不說久仰豈敢一類的客套，他在白鬍髭下露着笑容說：

“我們都是同樣的人物吓！”

他這一句話，無非是說梅蘭芳是一個做戲的，他是編戲的，彼此都是舞台的人物。但是此老頗有矜誇他和梅蘭芳都是所謂世界名人的意味。梅蘭芳，自然極客氣地說了許多景仰和不勝榮幸一類的答詞。

常被人家用許多問題詰問的蕭老頭兒，他乘梅蘭芳還沒有提出請教一類的話前，先下手為強，他便問道：

“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個寫劇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戲的時候，觀眾是需要靜聽的，為什麼中國的劇場反喜歡把大鑼大鼓大打大擂起來，難道中國的觀眾是喜歡在熱鬧中聽戲嗎？若使叫英國的小孩子聽了，一定會發驚瘋的。”

梅蘭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國戲也有靜的，譬如崑劇，從頭到底是不用鑼鼓的。”

蕭老頭兒被強迫坐了下來，大家都靜穆地圍着要求他講演，他仍舊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突然從皮椅子上站了起來，照例說了一聲：

“小姐和君子們請了……”

他接着用演說者應有的聲調說了一大套表示他不願意也不預備在上海作什麼演講。他說“我到這裏來，好像是動物園中的一件陳列品，你們既已經都看見了，我想也不須再多說話了。”他最後表示很願意受座間任何人很隨便的質問，只要不是嚴肅而非沉悶的，他都願意答復。

不知道是那一位先生，葉公綽呢還是林語堂，問道：

“先生爲什麼理由，不吃肉？”

“我不喜歡吃，便不吃，沒有理由，也沒有什麼主義。”

若使別人說了這一句沒禮貌的回答，或許要使人生氣，但是蕭老頭兒是一個著名愛說俏皮話的，人家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哈哈地大笑起來。

現在是輪到送紀念禮物的時候了。筆會的同人，派希臘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隻大的玻璃櫃子，裏面裝了十幾個北平土產的泥製優伶臉譜，紅面孔的關雲長，白面孔的曹操，長鬚子的老生，包紮頭的花旦，五顏六色，煞是好看。蕭老頭兒裝出似乎很有興味的樣子，指着一個

長白鬚鬚和他有些相像的臉譜，微笑着問道：

“這是不是中國的老爺？”

“不是老爺，是舞台上的老頭兒。”我對他說。

他好像沒有聽見，仍舊笑嘻嘻地指着一個花旦的臉譜說：

“她不是老爺的女兒吧？”

當許多人圍着蕭老頭兒在爭看那個小玩意兒，魯迅一個人，似乎聽不懂英國話，很無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語，一會兒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間裏去了。

十分鐘後，我們的汽車跟着宋子文的自備汽車，我們又在宋慶齡女士的住宅前了。

最初是由充任臨時翻譯的洪深林語堂傳達道：“請新聞記者們公舉代表六人進去。”

但是可愛的蕭老頭兒，不要叫人失望，他徵得了房東太太宋慶齡女士的同意，把所有中外新聞記者們，都請到草地上去了。

雪白鬚鬚的老頭兒，先立在一隻鴿棚前：想去撫摸一隻無知小白鴿，那小東西撲的一聲飛走了。

記者們，老是那樣地提出了許多很嚴肅的問題，要他發表關於遠東，中國，東北，社會……各種的意見。他也

老是用着他習慣對付新聞記者的方法，像調侃又像諷刺說了一大篇談話（詳見今日各報所刊伯納蕭談話）。中間有一個外國報的新聞記者，聽見他揶揄蘇俄革命的成功，和蕭老頭兒爭辯了許多時候。老頭兒照樣說着俏皮話從容回答。宋慶齡女士臉上表現滿足的神情，站在草地石階前。閉緊着將要笑出來的嘴唇，很有興味地傾聽蕭老頭兒巧妙的議論。

三點廿五分了，我因事不得不離開蕭老頭。當我離開那個祇能上海勾留八小時的愛爾蘭七十七歲老人時，我看見戴眼鏡穿馬褂的蔡元培，和刺蝟鬚髮的中國老作家魯迅，他們二人正靜穆地站在草地一旁，仰頭望着天空看雲，我行色匆匆，也來不及問他們對於蕭老頭兒有什麼意見了。

二月十七夜

——大晚報，二月十八。

儒林最新史——倡優苦

第零回 斷髮文氓枉操夷語

滿堂花臉難識人心

話說當天下午三點多鐘，蕭伯納等就離了世界學院，回到孫夫人家去了，按下不表。却說世界學院的小客廳

裏，只留下幾個當差的在收拾屋子；其中有一個叫做王七，從前當過西崽，會說幾句洋涇浜，他指手畫腳的把蕭伯納說的什麼，講給大家聽，掃帚都丟在旁邊，地也不掃了。碰巧一個小職員，綽號叫做老大的走了進來。這老大的英國話自然說得比王七好些。他聽王七亂說，就駁了他幾句，這樣，兩個人就爭論起來。王七說，他明明聽見蕭伯納指着老生的臉譜問是不是中國的老爺。老大說不是這麼一回事。王七就說，“那還要爭，當時那位朱如澗先生，頭髮剪得齊齊的，刷得雪亮，一身好洋裝，比你老大漂亮多了，人家是留學生，強似你這個土老頭兒；他就回答了蕭伯納說：——不是老爺，是舞台上的老頭兒。”老大說，“嘿，那朱先生我知道，他就聽不全，他講的洋涇浜，只有你懂得，你看見蕭先生理他沒有？”王七說，“那白頭髮老先生自己就不懂自己的大英話！我服侍過不少洋大人，也沒有見過他那麼大模大樣的。他配當老爺？老爺只有像朱先生那樣的人，才當得。他就算懂得，聽人家說，那個像他自己的老生臉不是老爺，他也要惱羞成怒，氣得不理人罷了。”老大道，“好，你和你的朱先生只會這樣使小心眼兒。告訴你罷，那蕭老先生說的是：中國戲台上的臉，一看就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誰是文官，誰是武官，

誰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清清楚楚；我們世界上的人，倒難對付得多，搽脂抹粉，裝腔做勢，明明是洋奴，偏要充英雄，這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王七瞪着兩隻眼，一時說不出話來。

早知後事如何，不必下回分解。

擁護

若谷

有人說：「我們要求言論自由」。
我說：「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
歷史告訴過你，也告訴過我，在每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時代，會有某種新的文體產生出來，無論什麼事，愈是鉗制得厲害，愈是束縛得厲害，愈是壓迫得厲害，其要求自由的反抗精神自然也更有力。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爲了劉煜生案，發表宣言，表示其嚴重的抗爭，這便是中華國民，要求政府保障言論自由的一件最近事實。

惟其言論不自由，纔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制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

若使言論自由了，上海灘上的小報，和「論語」之類的東西，不是都要歛聲絕跡於黃浦江畔嗎？爲此我們要擁護言論不自由！

馬相伯老人之答問

余讀今晨時事新報載蕭伯訥香港旅次來電，稱伊此來正欲反叩中國人民，對於余及西方人之意見若何。老邁如余，請代表“老大中國”一言。

余憶一八八四年訪英時，觀光牛津劍大學，彼時希臘古劇尚流行：如今蕭氏一流之新劇，不僅能在英國扮演，且推廣至其他各國，此余對於蕭氏之彼，不禁有今昔之感。且其時愛爾蘭在英壓迫中，禁用其語言，今愛爾蘭自治邦得公然提倡，勵行國語教育。蕭氏爲愛爾蘭人，雖似不關切此種事，當亦熟悉也。余之感想，中國成語：“人惟求舊，器惟求新！”與古經有：“太陽之下無新世事。”相印證。我國人民，方羨慕愛爾蘭之恢復獨立自主，以其發揚加特力宗教之精神，不知蕭氏，亦有懷舊之心乎？惟余在國難時期，夙主張人民自救，誠以我有四萬萬七千萬人民，果能發奮自強，真如蕭氏所謂：“中國人民聯合起來，世有誰人能與之抗？”惟我國以機械軍器不如人，故日前受困於東鄰島國，非衆寡之勢不敵，乃新舊之器不同。希望我執政當局，採蕭氏“China help thyself”之嘉言，努

力救中國！此則應向蕭氏，表示余之同情。余尤希望國人効法愛爾蘭人，求獨立自主之精神，以抵抗暴日到底，故目前對平津熱河，更誓死自衛，詔告世人，民爲邦本，造成民治之新中國。

——大晚報，二月十七日。

註：——馬相伯老先生的話，句句都“對”！不過“人惟求舊，器惟求新，”這是說：人是越舊越好，軍器是越新越好。中國政府的不抵抗或者假抵抗，大概就是因爲老人太少而新軍器也不够，等够了大概就可以抵抗了？現在不是在募飛機捐嗎？還少一種“製造老人捐”，尤其是加特力(天主教)式的老人應當加工製造。此外，馬相伯先生是老前輩，總還記得慈禧時代的“興復海軍捐”和袁世凱時代的“愛國儲金”罷。所以馬老先生向蕭老先生去募飛機捐的時候，假使他真要“代表”老大中國。那麼，除掉申說“非衆寡之勢不敵，乃新舊之器不同”的理由以外，請他不要忘記告訴蕭先生“興復海軍捐”和“愛國儲金”等等的經驗。假使竟忘了。那真是老得只剩“幽默”了。

翁照垣將軍致蕭伯納書

蕭伯納先生鑒：欣承先生來華，並視察一二八淞滬戰役之遺址，照垣以事離滬，不能陪駕，殊抱歎仄，茲謹贈拙著英文淞滬血戰回憶錄一冊，爲先生來華之紀念，且使先生親見強暴者砲火餘燼之後，更披閱是冊，可知當時被壓迫民族浴血苦戰，可泣可歌之情況，更仰先生爲當世文豪，平日嘔出心血，寫盡人類喜生惡死之哲學，領導羣倫，踏進和平大道，庸詎知際此泰東西競尙文明之世，我遠東尙有此狺狺者，日施其猙獰面貌，殘酷手腕，而視人類和平於弁髦耶，然則先生既臨此境，復悉此情，對此人類，又不識灑幾許慈愛淚也，伏希珍重，翁照垣謹上。

——申報，二月十八。

• • •
 [“補白”]

讀飛機募捐啟有感泣而歌之

去年今日此吳淞 大砲飛機相應轟
 大砲不知何處去 飛機依舊打秋風

東西戲劇家兩權威晤談

“當介紹梅蘭芳時，蕭氏與之立談頗久，由張歆海氏翻譯。蕭氏謂英國戲劇演時無鑼鼓等聲音，蓋演劇時一有雜聲，損害觀衆之注意力，而中國演劇時頗覺過鬧。梅氏答稱中國戲劇有兩種，如崑曲卽爲不鬧之一。葉公綽氏當卽謂梅君之演劇并無鬧聲，有之亦爲音樂之相助而已。梅君繼卽致景慕之詞，并言余舞臺生活已有三十年；平素知愛爾蘭人富於忠實友誼，今後甚願與蕭氏認識作一朋友。蕭氏聞梅君有三十年之舞臺生活，而注視其面容曰，君誠有駐顏術哉。”

——申報，二月十八。

“日昨蕭伯訥來滬，忽忽小駐，凡其言行，報章傳播，特爲詳盡。蕭之爲西方戲劇界之權威者，無俟贅言；會東方戲劇界之權威者梅蘭芳，息影海上，因得良晤，兩雄握手，盛極一時，各報亦均記載，惟尙有一二語，可爲補輯者，特再記之於右：

方梅之晤蕭，張歆海君一爲介紹，蕭卽曰余與若正相同也。（其意卽謂彼此均從事戲劇藝術者）余正欲暢聆中

國之戲劇，惟何以中國鑼鼓特爲喧囂？（以上見日昨報章不再述）又梅氏稱述愛爾蘭人富於忠實友誼，蕭卽答以君似未宜特加信任，渠等背君正亦不知所爲何事！最後梅氏又謂此次惜余息影海上，君卽北行，余乃不得以東方戲劇之特有藝術，以男子飾女角者爲君觀之，殊深歎疚！且余曾赴美洲，此後更希望赴英國一行，屆時必至愛爾蘭奉訪請益，蕭氏聞而欣然，此後蕭氏卽應座客之請，起而作幽默之演說矣”。（知）

——申報“春秋”。

〔“補白”〕

兩雄吟

兩雄握手太荒唐	萬里相逢個半郎
笑問駐顏狂伯納	漫誇愛族俏蘭芳
夫人莫道華倫賤	博士能令文學香
只恨匆匆又離別	未曾色相一登場

蕭伯納論

張資平

“革命的表現是在行動，——並且要是永續的行動！，我常常以這句話來批判在中國最流行的偽革命家和偽馬克斯主義者 (Pseudomarxist)。現在我又要這句話來批判蕭伯納了。即蕭伯納決不能稱爲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作家。……”

我國文人竟有以“蕭伯納之讀資本論先於列寧”誇示於讀者，以爲是一個了不起的發見，這又何苦。至於拖着不必要的尾巴說，“就 Humourist 一點，我國有××足與蕭伯納相提並論”，更是不倫不類了。……”

——海潮，第二十一期。

· · ·
[義務廣告]

張資平著：

“跳躍的人們”——一九三〇年出版，主僕戀愛，姊弟戀愛，以宣傳勞資合作爲宗旨。定價大洋若干角。

“戀愛錯綜”——一九三二年出版，內容和前書相

彷彿，然決非雷同翻版可比，因書中人物之姓名略有改易，詳細情形亦稍有變動，而宣傳勞資合作一點則更着重，特別露骨。定價大洋若干角。

“蕭伯納論”——全文見申江日報附刊“海潮”第二十一期，此文並未將宣傳勞資合作之張資平與“真正老牌”馬克斯主義者（“或Ultra-marxist”）之張資平“相提並論”，故不至於不倫不類，而對於中國文人之認蕭為完全的社會主義作家一事，亦能無中生有，毫無實例，即加以肯定，筆力之強可想而知，殊有百讀不厭之價值也。定價大洋若干分。

Ⅱ 匪蕭的國際聯合戰線

“字林西報”的幽默

“大陸報”和蕭伯納的“不誠懇”

“大晚報”的不凡和難堪

“每日新聞”的卑污

俄國公主論蕭伯納

白俄報的義憤

附錄：——胡適博士的詞令

呸蕭的國際聯合戰線

蕭伯納到中國來，在香港就放了一個大砲——“宣傳共產”；在上海也沒有說什麼好話——很有鼓動民衆推翻戲子統治的嫌疑；在北平又罵“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二十二日申報）。這老頭兒最愛說人的壞話，自然是討厭而可惡得很。他既然處處得罪人，難怪引起了國際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

英國的上海政府半官報，字林西報，罵他想做鮑羅廷。

中國的上海當局半官報，大陸和大晚報，罵他“不誠懇”，罵他“賣狗肉”。

日本的上海殖民地機關報，每日新聞，罵他怕老婆。

白俄的上海移民機關報，上海霞報，罵他“掛羊頭”（下半句和大晚報同）。

上海的國際聯合戰線還不够，在北平，因為胡適博士的主張——那主張也很“幽默”的——學界和教育界拒絕招待他。

這聯合戰線煞是好看。因此，我們把蕭伯納一九三三年遊華事件的“呸蕭文件”都收集在這裏，請大家看看。

字林西報的“幽默”

蕭伯納和鮑羅廷

蕭伯納到上海的那一天，字林西報的記者大概沒有單獨見着他這位貴同胞，因此也沒有能夠和他說幾句“體己話”。是蕭太不愛國了，不以大英帝國的“臣民”自居，不肯單獨的接見上海的英國政府半官報的記者呢？還是那位記者先生“不屑”去見他？這是無從查考的了。總之，字林西報之內發現了一個什麼 In Parenthesis——“引號裏”先生，而蕭伯納之外，又出現了一個 Mr. Beoge Gernard Pshaw——呷蕭求納。於是乎字林西報上就登出了這位Mr. 呷蕭求納接見“引號裏”先生的談話記的“幽默文章”：

In Parenthesis——引號裏

一個談話

“Houp-la, 我們又在這裏了！”

In Parenthesis 奉命去訪問 Mr. Beoge Gernard Pshaw 的時候，他彷彿受着一個突然的打擊，而那位上了年紀的老教員正在面對着窗洞看

那甲板上走過去的船長。In Parenthesis站在丕蕭先生的艙門口，慎重的咳了一聲嗽，而這篇文章開始就寫着的那句話，却使得那位哲學家回過身來，他向着可能的訪問記者說：

“你要什麼？”

就是這麼樣，不過還要嚴肅些，假使你們懂得這個意思。也許應當寫下來：“你要什麼？”

“我是 In Parenthesis, 丕蕭先生，我奉命來調查：你要想把你的偉大歸在什麼上去。”

“誰說我是偉大的？”這個長鬍鬚的滑稽家就問了。

“好罷，你曉得，Sir，”訪員就回答了，“有些人以為你偉大，有些人倒是另外一種意見。我是奉命來調查你的偉大是屬於那一方面的。”

“主要的是因為人類都是些蠢貨，他們永久不會找着我？”

• • •

“假使他們找着了 you，你的提議是要他們想什麼呢？”

丕蕭先生停頓了一下，就說：

“爲什麼你要提議叫人類去想呢，我在最近四十年來一直在這裏替他們思想呢？”

“你以爲世界是非常之感恩的嗎？”

“沒有利潤是不帶着尊敬的，除非在自己的國家裏，”這位哲學家像宣讀判決詞似的說了。

“Sir，我還要問一問，你是否的確是這樣想呢？”

“我的小孩子，我在你沒有出生以前很久的時候，也曾經和你一樣的想法。你難道真的以爲你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就一定每一次都有什麼意思嗎？”這位偉人說了這句話，還斜着眼睛看我們，“你知道，我並不想丟掉一顆難得的珍珠，但是，爲什麼我一定不可以用整串的珍珠去裝飾 Gadarene 的項頸呢，我無論如何也不懂得。不過，你倒底說了你到這裏來幹什麼的？”

“好呵，Sir，我說過了，我是來要求你的談話的。”

“我向來不發表什麼談話。有時候，一個偶然的訪員自然也會趁我不注意的時候，來偷竊一次談話，然而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不能夠爲這

一類的事來枉費。”

“但是，呷先生，他們說你在香港勸二十歲的青年做共產黨？”

“他們為什麼不應當做呢？難道你以為對於他們——做一個真正道地的革命黨，倒比熟讀我最近四十年來所寫的昏話要好些嗎？”

“然而我堅決的以為這是昏話，呷先生”，訪員冒險的說。

“我對於你的思想過程是不負責的，青年人，而且這個事實給了我很好的安慰，尤其現在我看見了你的時候。無論怎麼樣，當他們被共產主義糾纏住了的時候，他們就不會枉費自己的金錢去買 H. J. Bells (韋爾斯的“改姓”——譯者)，或者我所想得到的別些廢話商的夢話了。”

“但是”，訪員又冒險了，“你是否以為布爾塞們 (布爾塞維克的縮寫——譯者) 還有比你更能幹的人材，他們會宣傳他們的教義，而你却把這種教義拉在自己身上。Michael Borodin (鮑羅廷) 之類，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

“假使你的意思是我所非常之懷疑的，”吓蕭先生回答，“那我就不知道這算是什麼。”

“好罷，”訪員被吓蕭先生的態度弄糊塗了，就這樣問他——“你可知道：

‘你是老了，威廉爸爸’——那青年人說，——
‘你的頭髮已經白了；

‘你還是不斷的要把腦袋放在底下，
你想，在你這樣的年紀，這是不是對的呢？’

“Houp-La’ “吓蕭先生回答說，”我知道
怎麼答覆你：——

‘我年輕的時候，’——威廉爸爸回答，——
‘我怕這要使得我的腦筋腐敗，
但是我現在是完完全全的吓蕭，我沒有什麼了，

爲什麼我還要做了又做呢！’

你出去的時候，青年人，隨手把門帶上了罷。”
於是乎他轉過身去，把背朝着訪員，而又面對着窗洞了。

(二月十八日字林西報)

字林西報似乎出了一口氣，蕭伯納被他刺倒了！帝國主義的大人先生和小訪員之流，其實自己倒是這樣想着：“沒有利潤是不帶着尊敬的；除非在自己的國家裏面。”蕭伯納收一點兒版稅，坐一趟周遊世界的“不列顛皇后”，還得着殖民地民衆的真正的尊敬。這難道是“億萬富翁”的殖民專家所眼熱的嗎？當然不是！他們是討厭他不肯變成“瀝石”。他們自己拿着鎗砲飛機到殖民地地上來購買“尊敬”，搜括幾萬萬民衆的膏血，而蕭伯納之流偏要來戳穿他們的西洋鏡，所以可惡，所以要說他是搶了鮑羅廷的飯碗。如果蕭伯納是把自己的腦袋“放在底下”，那麼，這班“殖民專家”——Colonisators 是要把殖民地民衆的腦袋永久捺在地下。

抬起頭來罷！抬起頭來，向這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的確不願意做瀝石，我們要請你們出去了。出去罷，去！去！——假使你們到那時候，慌亂得來不及隨手帶上中國的大門，那也可以不必費心了！

附記：字林西報的記者只訪問到了一個 B. G. 吓蕭；而路透社却忽然拿出殖民家的通信機關的身份來，表示非常之關心中國的國難，而討厭中

國人的歡迎蕭伯納：——

“〔二十日北平路透電〕……政府機關報(?)今晨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載蕭伯納抵北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

而大晚報的春秋筆法又在這電報上加上頭號字的標題曰：——

“大戰將發中·平報迎蕭·用廣大篇幅載蕭氏事·路透評華人不知痛苦”云云。

大陸報和蕭伯納的“不誠懇”

——中西會串的變質

大陸報：

“中國報界懷疑蕭的思想——

——「英國作家的不誠懇」是各報社論的基調”

(大陸報，二月十八日)。

這樣的大字標題，是要寄到西洋外國去，給外國老百姓看看：中國的“文明”報界怎樣冷酷的對待了蕭伯納。

但是，在上海的人看見這種標題，未免覺得奇怪。那裏又跑出了什麼“基調”，什麼“不誠懇”，什麼“懷疑”？

不要說上海的民衆，他們早就被蕭伯納“宣傳共產”的標題驚動了……他們假使有什麼“懷疑”，大報上還會不登麼？而我們看的是：有許多團體的代表去歡迎，有許多傳單飛在羣衆裏，有許多口號……這些是報紙上都登載了的。

說是報界罷，那麼大陸報自己己也用小字記載着：——各中文報紙大抵出版了蕭伯納附刊，大致說蕭伯納是偉大的文學家，是現代的天才，是費邊社會主義者，但是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中國人歡迎他，因為他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同情於被壓迫的民衆。這顯然是大陸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什麼報界，那一家報的報紙，誰——對於蕭很“懷疑”，認為他“不誠懇”？誰？！真的是全上海的報界嗎？！

把大陸報的這段記載細細的看了一遍，呵，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這裏是說上海有一家報紙，而且只是晚報，就是現在不大有人要看的“大晚報”，——這上面有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的確罵蕭伯納“不誠懇”——“掛羊頭賣狗肉”，而牠自己却又要諷刺蕭的諷刺。朋友告訴我：大陸報上的社論常常譯好了轉載在大晚報上去，這裏是一套中西會串的雙簧戲。我就不辭勞瘁的，在隔壁衙堂的字紙籠裏，找着了大晚報社論的原文。讀了一遍，不大懂得，似乎大晚報是要蕭伯納分散家財實行共產似的。實在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也許是想請蕭先生來坐中國的模範監獄，或者反省院之類。總之——言歸正傳——一家晚報館就可以代表全上海的中國“報界”，一篇社論變成了多數的社論（Editorials）而且還是一切社論的基調！這個戲法實在變得有些離奇。

不過，英文文法裏只要兩篇社論就可以用複數，稱之曰“Editorials”，而第二天的俄文報倒也有同樣意思的兩篇小文章，這就成了中英俄的三簧戲，——一張大晚報加上一張白俄報就代表了全上海的“中國”報界！哈哈！

大晚報的不凡和難堪

漢文大晚報——據洋文大陸報的說法，彷彿代表着上海的中國界（！），但是大晚報關於蕭伯納的社論，在漢文報之中却是獨一無二的，真所謂“究竟不凡”。這社論不用說是反對蕭伯納的，絃外之音大有一筆勾消蕭的偉大之概。看他怎樣勾消罷：

蕭伯納究竟不凡

“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的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百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

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着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於社會主義，可說是個澈頭澈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銖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着百萬鉅資面團圍早成了個富翁。蕭先生唱着平均資產的高調，為彼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衆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着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憊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裏，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殭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

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祇爲自己怕做蠶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裏混出頭，祇求不僵，祇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嘗沒有。坐在安樂椅裏發着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麼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着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着無產同志的襤褸裝束，坐着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大錢報)。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

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祕訣；(二)這祕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爲着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喫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羈爲羶不，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贊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贊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智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着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爲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

“坐在安樂椅裏發着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喫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却沒有因為這些人“受着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日文“上海每日新聞”的卑污

日文“每日新聞”關於蕭伯納的“記載”——其實是謾罵，可以算得傑出的了，請看罷：

蕭的念念不忘者

(太太的“嬌羞病”出診記)

世界的嘲弄專家蕭翁在十七日的早晨，說是“因為太太生病”，拒絕了宋慶齡女士請他上陸的事實，傳了開來的時候，等在稅關碼頭上的記者團之間，就有了一個電光似的宣傳的故事。

——有一個蕭所念念不忘的東西，就是他的太太。雖是世界第一的嘲諷老頭子，却是很怕老婆的呵。最不高興旅行，但只要老婆一拉，就連朝山也會去。對着老婆，是抬不起頭的。老婆也不像她的男人，非常怕羞，聽說還沒有和蕭一同照在新聞照相的鏡箱裏面過。今天的“病”，也是“嬌羞病”呀，一定的。——

但到午後，此翁竟難却宋女士的邀請，鑿上陸來了。於是記者……就和漫畫家波多江種末氏一同，到吳淞洋面的“英后”上去診病。正如翁自己對於“好共產主義者”所下的定義，說“是住在布爾喬亞的邸宅裏，用着不要工錢的管家婆的頭腦之所有者”一樣，他倆的船，實實在在是海上的浮城。……走進船裏面去，只是兩個字：“豪奢！”聽說此翁站在朋卑的廢墟上，曾經說過“真還想破壞牠一次來看看”，記者也很想破壞這海上的宮殿起來了。走到事務長室去，問問蕭翁的“不要工錢的管家婆”的所在，回答是：

——太太是第三艙的一六一號室，蕭翁是對面的一五九號。

漫畫氏和記者就趕忙跑去想診脈，然而對手乃是連討

厭記者的蕭翁也沒法想的“嬌羞家”。這回的出診，不知道在胸脯上按着手，來打診呢，還是不過牽線脈那樣程度就算呢？出診者們正在船室面前想，機會可賞給了這位蕭太太的出現了。是從頭髮到臉，皮膚，從衣服到襪，鞋，全部都是褐色的老婆子。臉是圓的，眼睛下面的肌肉，鬆掉了，在銀腳的，沒邊的圓眼鏡後面畫着臉譜。鼻子圓圓，是和蕭翁的鷹嘴鼻取着調和的。右手拿一本厚厚的書，是從讀書室的歸路。

——這婆子會怕羞嗎？

記者輕率地斷定着“害羞者，女孩兒家也”，而婆子却將下巴槓在記者的鼻子跟前了，一面用手推着門。

——過道上就請走過去，不要站住。

真是一八九八年和世界第一的嘲弄專家結婚以來，三十有五年間，受了灌輸的辛辣。但一知道“新聞記者的訪問”，那挑戰的態度就無影無踪。

——因為，我，不見人。

連拒絕的話也不過這一點，脫兔一般跳進了門裏面——恐怕——屏住呼吸了罷，一點聲息也沒有。漫畫氏與記者於是完成了“嬌羞病”的診斷，回到小火輪上了。”

(二月十九日日文“上海每日新聞”夕刊)

這種“文章”真正是村婦滿街，無聊之至。日本新聞記者想不出什麼別的話來罵蕭伯納，就亂造一大篇謠言，說離不了女人，怕老婆之類。這難道還不是卑污無能嗎？



“每日新聞”所載的漫畫。

俄國公主論蕭伯納

上海俄文報“Shanghai Zaria”(上海霞報)——顏色當然是白的，二月十九日也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和蕭”。這裏的“我們”是誰？我想用不着註疏。好在這篇“美文”並不長，而且照署名看起來似乎還是一位“高貴的”美人兒寫的：“Mery Devid”，所以趕緊重譯轉載如下：

“我們和蕭”

“如果著名的伯納蕭能夠在上海多留幾天，那他就可以看一看人家談論了他些什麼。也許，他還要請當地的新聞記者去，自己問他們幾個問題，譬如說能：

——你們還承認我是“偉大的人”嗎，或者，你們以為“偉大”這個字只是形容我的過去和我的身量的嗎？

——我的共產愛國同志，這樣冷淡的招待了我，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你們是否以爲我和著名的俄國革命祖母白萊史珂·白萊史珂夫斯嘉有點兒相同呢？

——你們是否以爲我提出來的口號，勸當地的共產黨員“趕快逃跑罷”，是非常之妙的呢。

——我對於蘇聯沒有私心的忠順，我的讚美蘇聯是不受報酬的，你們是否認爲可愛呢；爲着這個緣故，你們是否以爲我也受得起像“列寧的琉璃棺材”那樣的紀念碑呢？

——一般的說罷，你們是否認爲我是“躲在盒子裏去”的時候了，因爲除此之外，我是什麼也不能夠做的了？

然而可惜蕭走得太早了，因此，他簡直不知道上海人對於他有些什麼樣的想頭。

我自己，無論同什麼人都很少談起蕭，然而，照我在各處所聽見的零碎的意見看起來，我却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上海人從蕭所得到的欣喜，比他從上海人所得到的欣喜還要少些。

譬如有一位體面的先生，當蕭從楊樹浦那邊就躲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一批新聞記者去問他怎樣就可以找着蕭，這位先生的回答是：

——你們在報紙上去登一個廣告罷，就說：“遺失山羊式鬍子，花白頭髮的老頭兒一枚。”

另外一位先生，以前是很崇拜蕭的創作的，他讀過了這個著名的羅達萊俱樂部的戲劇作家的答覆，很誠懇的表示他的驚異：

——唔，你要知道——他說——這個之後，我要認爲蕭以前的好作品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他的當差的寫的。那些劇本，蕭當然是寫不出來的。

至於私人談話之中加在蕭的姓名上的那些各種各樣的形容詞，我在這裏不願意說，這並不是因爲我怕羞，而是因爲我本來不是造謠專家。

上海對於這個著名的老頭兒的態度，最好用一句俗話來形容牠，這句俗話，在蕭還沒有來得及回到輪船上去繼續自己旅行的時候，就已經傳遍了全城。

這句俗話固然是老話，不過特別爲着蕭改造了一下：

——來了，看見了，撒了濫污了。

Mery Devid ”

(二月十九日白俄報“Shanghai Zaria”)

這裏的署名寫着“Mery”，是一位“女作家”，當然更是公主了。

這位公主還害羞，自己聲明不是造謠專家。但是，她居然代表上海市的二三百萬市民說：“上海人”怎麼怎麼對待蕭，又是涼淡，又說蕭是山羊式的老頭兒，又說“那些劇本，蕭當然是寫不出來的”等等。她自己說“無論同什麼都很少談起蕭，但是，她立刻就跑遍了上海市，而且調查得清清楚楚：彷彿上海人已經把一句拉丁成語改成了“俄國俗話”，而且“傳遍了全城”。這位公主的“並不造謠”的本領實在不小。

但是，她不敢提起蕭伯納說的一句話！“假如今日君返國之後而仍能逃走者——君於此時返國一觀察，必知今日情形之甚佳矣。”

附記：據從俄文譯成英文的英國朋友 Mr. Arnold 說，她這篇“美文”有幾句不大通，例如末了的一大句。但是，這個俄文通不通的問題，我們管不着，——萬事有公主自己負責，——所以仍請 A 君逐字逐段“直譯”，再重譯轉載在此。

白俄報的義憤

二月十九的俄文報“Shanghai Zaria”還有一篇“文藝評論”，據說很“幽默”。但是，這並不是對於蕭伯納的批評，而是贊美一個不知道是從什麼年代成名的英國青年作家，名字叫作 J. B. Priestly。問問英國朋友，——英國朋友說不大清楚，問問中國的世界文學專家，專家說沒有聽見過。上海的尊貴的白俄，向來只會讀些“花園馬路文學”（literature of boulevards），或者英國人的所謂“黃封面的文學”（yellowcovered literature）。但是，上海的“黃封面”的小說似乎也不少，查起來未免太麻煩了，連我的英國朋友都拒絕我的請求，不肯替我跑腿；他馬馬虎虎的寫了上面那樣一個拼法，還申明這個姓名的拼法“J. B. Priestly”未必就對，因為只是從俄文字母一個一個的譯成英文的。總之，據這篇“文藝評論”說，這個新進的青年作家普里斯脫萊（Priestly），要比蕭伯納高明得多，正直得多，誠懇得多……

這位青年作家寫了些什麼呢？第一部小說叫做“好同

志”，第二部小說叫做“安琪兒的行人道”(“Angel Pavement”)，第三部大概還沒有寫出來。這個“大作家”的作品能够使得“小人物的世界……成爲很有意義的很重要的世界”。那“安琪兒的行人道”裏，描寫了一個小會計密斯脫斯密司，——據說這是一個建設精神的代表。這裏說的當然不是蘇聯式的建設，而是白俄式的建設。俄文報還嘆聲歎氣的說：

“這個小會計密斯脫斯密司和最近在美國暗殺羅斯福的那個發瘋的意大利人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呢？

當然沒有什麼共同之點，然而，他們兩個人都是自己的時代底產兒。”

爲什麼？因爲現在時代的“小人物”都有點兒倒楣。問題是在於一種“小人物”很“滿意自己的命運”，而另外一種“小人物”却不肯安分。普里斯脫萊小說裏的“小人物”是安分的——所以是建設精神的代表。而事實上的“小人物”，譬如美國的“暗殺黨”，都不滿意自己的命運，所以是破壞的無政府主義的魔鬼。

這個美國的暗殺黨的口供說，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就痛恨自己的同學，只要他們比他穿得好些。後來，他就痛恨一切富人，一切有幸福的人，一切成功的人。這樣，他

的痛恨達到了極端的時候，他就決定去暗殺一切國士和總統……”俄文報接着就說：“不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充滿着這種情感，就是低等階級對於高等階級生活和享福的敵意和嫉妬，也是這一種瑣屑的庸俗的情感。”於是那個所謂新進的“偉大的，正直而有絕對的天才的英國作家，甚至於是這樣的世界作家，”——這個普里斯脫萊的功績，在什麼地方呢？原來：“比較一切宣傳不滿意和不妥協的人起來，普里斯脫萊之類的作家的意義和價值，是在於他們能够在社會的不滿的高潮上灌注一些安慰的油。”說句中國話，就是他們會灌迷魂湯。而據說，“這些作家，比我們地球之上的一切反抗派和不調和派，都要更加真實”。

“他們是真實的，——因為沒有羣衆對於自己命運的滿意和安分，就不能够建設任何的文明，甚至於共產主義的文明”(!!!)

阿呀呀，不得了！白俄不但很關心文藝的“真實”，而且還關心“共產主義的文明”！

蕭伯納自然是很不偉大的了，很不真實的了，因為他喜歡宣傳抵抗，不滿意，不妥協等等。因此，蕭伯納還沒有白俄那麼熱心於文明的建設，甚至於“共產主義文明”的建設。

於是乎白俄報紙就義憤填膺，以至於語無倫次，忽然間關心起中國工人的生活，中國西崽的工資……來了。請看白俄報紙從“安分的”普里斯脫萊的“小人物”說起，居然做出了這麼激進的，幾乎是“革命的”結論：

普里斯脫萊之類的作家是“真實的，因為他們比那些口頭上說的是這樣，而事實上做出來的又是另外一樣的人，要正直得多。”

“請你們讀一讀關於前天歡迎蕭伯納的奢侈的午飯的描寫罷。

喫那一次午飯的，或者是名人，或者是喜歡和名人挨肩並坐的人們。

那次午飯，當然布置得非常之好，桌子旁邊有數不清的僕人侍候着。

然而爲什麼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改革家的蕭的誠意，那樣不澈底呢？爲什麼他只到了這一家闊氣的洋房裏，而且是坐着非常之奢侈的汽車，剛剛從奢侈得像神話裏的傳說似的大輪船上下來；這隻輪船所載的都是些百萬富翁，照別人的描寫，這輪船的奢華富麗是不用說了。

爲什麼他不到一個非常可怕的上海貧民窟裏去看一看？

爲什麼他不問一問這一所歡迎他的洋房裏的西崽和苦力的工資是多少，——就使在午飯的時候也可以順便的問一問的？

而最主要的是：爲什麼他不肯承認——這一點他所很知道的——如果他是天堂式的蘇維埃國家的作家，那麼，他什麼也不能夠有，除非還有一條舊褲子，他也不能夠在‘不列顛皇后’上周游全世界！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普里斯脫萊和他的‘英雄’，比較起空想的蕭伯納的英雄，以及蕭伯納自己，都要正直些，都要更加有意義些”。(白俄的上海覆報，二月十九日)。

好了，好了！俄文報的“文藝評論”也就這麼完了。這是他們的“結論”。

這裏中國讀者可以得到了一些教訓：倒如高爾基只該一條舊褲子，此外什麼也沒有；蕭伯納沒有到貧民窟裏去，就證明了他的不誠懇；而俄文報的記者，在蕭伯納的桌子旁邊去數過了西崽的數目，但是沒有數清楚等等的‘文人軼事’。至於中國貧民區域的生活，中國洋務工人的工資，蕭伯納在國際反帝大同盟的調查表裏，也許早就看見過，也許沒有看見過。這都不要緊。最主要的是：——他忘記了早這麼一二十年到俄國去勸告“羣衆滿意自己的

命運”。

是的，蕭伯納大概早就知道做紳士和資本家的保鏢的，薪水並不大，因此，他決計不替他們保鏢。他“背叛了”紳士階級和資本家。幸而他自己是“百萬富翁”，否則又要說是人窮志短，得了蘇聯的盧布。但是做了“百萬富翁”也不好，害得俄文報義憤填膺，又去責問他爲什麼不去看看上海的貧民窟。原來因爲俄國羣衆的“不滿意”的爆發，弄得他們這些王孫公子變成了喪家之犬，幾乎要流落到這個貧民窟裏，永世只做中國工人的罷工破壞者。彷彿他們的流落，蕭伯納也“與有罪焉”。

唔，俄國的王孫公子和資本家的少爺小姐呵，你們現在也知道了貧民窟是“非常之可怕”的了?! A?!

[附錄]

胡適博士的詞令

蕭伯納今晚六時三刻抵此，在車站歡迎者，有中國新聞記者若干人，彼等包圍之，欲與之晤談，但蕭氏謝絕之，俟諸明日。北平教育界及學界決定在蕭游北平時不予以招

待，胡適之於蕭氏抵平之前夕發表一文，其言曰，余以爲對於特客如蕭伯納者之最高尙的歡迎，無過於任其獨來獨往，聽渠晤其所欲言者，見其所欲見者云。

(二十日路透社電)

胡適博士最近對字林西報記者說：“一個政府一定要保護他自己而鎮壓危害牠的存在的一切運動的權利”，（見二月二十一日該報）。胡適博士現在既然這樣忠順，但不再講什麼“人民的權利”，而且堅決的擁護“政府的權利”了，那麼，像蕭伯納那樣的“叛徒”，自然是他所不願意見的了，——也許是不敢見，因爲萬一天良發現起來，臉上難免要熱辣辣的飛起兩朵紅雲，顯得像梅蘭芳博士似的有點兒“駐顏術”。於是他也忽然“語妙”起來：明明是他主使北平學界不理蕭伯納，他還說這是最高尙的歡迎方法。他說聽憑蕭伯納要見什麼人就見什麼人，要看什麼東西，就看什麼東西。彷彿很自由。但是，假使蕭要看看北平的監獄，見見政治犯，那就未免有人要趕緊去通知張學良將軍，教他事前怎樣布置收拾一下罷。

Ⅲ 政治的凹凸鏡

附錄：日文“上海日報”和
“每日新聞”的記載

政治的凹凸鏡

——“比較翻譯學”和“小辮子的科學研究”

蕭伯納到上海說了些“閒話”，這樣也談談，那樣也談談，其實都是人家逼着他，他才說的，他本來並沒有“宣傳目的”。他一生一世都在“宣傳”，你要去問他，他自然只會說他所要說的話。但是，一些政治背景濃厚的記者，受着主人的囑咐，却想利用蕭的話來替自己宣傳。他們也會紀錄他們所要的“紀錄”，原文不大中意，還會捏造一些謊話。何況蕭說的是英文，從英文翻成漢文，或者翻成日文，甚至於像大陸報似的，還會從英文翻成漢文，從漢文再重新翻成英文，（不要忘記大陸報是中國當局的英文半官報），——這種複雜的過程之中，很可以做些手脚。這樣轉摺傳譯，就把蕭伯納的談話翻陳出新，弄出許多“修正”，“刪改”，“補充”，“捏造”的把戲來。

好罷，我們就借此來研究一下“比較翻譯學”。

真正的英國報，冒充的英文報，日本報，中國報都在我們的面前。蕭伯納的同一次的談話，而記載的大不相同，

尤其是關於政府和革命的問題，以及關於李頓報告書的問題。

先說關於中國政府和革命的問題罷：

(一)字林西報，——“回答着關於被壓迫民族和他們應當怎麼幹的問題，蕭伯納先生說：‘他們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衆應當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的王公’……”這幾句話不見於其他各報。什麼道理。大概因為統治着中國民衆的那些戲子和封建王公心上會不舒服。而英國帝國主義的字林西報把牠登載出來，却有點兒奇怪。莫非那些“戲子”還不大合於英國的胃口？可見做戲也不容易，美國人愛看了，英國人又有些討厭了。

(二)大陸報，——“關於現在中國中部共產黨反對南京政府的戰爭，蕭伯納先生說：一個好的統治者在民衆之中永久不會有好名聲的，因為十次之中有九次統治者不是一個好戲子，他不知道怎麼去取悅於他的民衆。”看罷，這裏的“戲子”變更了自己的地位了！從這句捏造出來的“蕭先生說的話”，彷彿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南京政府在民衆之中沒有好名聲，因此(！)，南京政府是一個很好的統治者，如果牠永久沒有好名聲，就證明(！)牠永久是好

的；而且南京政府的好，正在於牠不像一個“戲子”——不會“媚衆得寵”(111) 嗚呼，戲子呀，我們的好戲子呀，你們真正會唱戲，實在比蕭伯納自己還要“幽默”萬倍了。

(三)每日新聞——日本文的上海每日新聞記載得更有趣：“中國記者問：‘對於中國政府的你的意見呢？’——‘在中國，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幾個，你是指那一個呀？’中國記者只得轉爲左翼，另整姿勢……”這裏的詮調很像日本政府的外交公文。因此，蕭伯納說的“戲子”就消滅得無影無踪，蕭伯納所說的“中國民衆”總算還沒有變成“滿洲國”的順民！

(四)上海日報——日本文的上海日報捏造得還要“像真”，彷彿蕭伯納說過這麼“一串得意的共產主義的講解”：“世界各國的反對共產主義，實在很可笑，而且不愉快，例如亞美利加就是這樣的國度。亞美利加是壓制者的國家，沒有什麼國民的自由之類，簡直和奴隸沒有兩樣。而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這東西，好像弄錯了似的，掠奪東西，壓迫國民的所謂共產軍，那簡直是土匪。”蕭伯納被上海日報的日本記者改造過了之後，簡直是一個姦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陰影：他一方面恨美國，說美國是壓制者的國家，甚至於要勞動他的大駕去替美國奴隸爭取解放似的；別方面，

又恨中國的共產軍，說他們是土匪，“並非真正共產主義”，所以和中國當局同心同德，分工合作，一邊在北部“勦匪”，一邊在南部“勦匪”。不幸哉，蕭伯納。

（日文的每日新聞和上海日報的訪員其實根本就沒有見着蕭伯納，牠們的記載的藍本是“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泰晤士報的記者雖然是愛爾蘭人，而這個報的本身却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把牠們作爲附錄，放在本章的後面。）

(五)中國各報——關於被壓迫民族和中國政府的問題，大半都是這樣的記載：“上項問題殊難作覆，不如俟余離上海後，再作答覆，因在此地似乎不甚安全也。”但是，同時又發見另外一段，說是：“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絕非一般民衆所歡迎”。這一句，大概就是半官報的大陸報的記載的“根據”了。不過究竟是誰根據誰，還是一個問題，因爲後臺的“戲子的把戲”，比塗着花臉的前臺姿態更不容易看見了。這裏要提出的只是一點：中國的普通報紙，一些資產階級式的改良幻想家，還知道“抓到”蕭伯納的另外一句話：“中國爲政，每苦言論過多，殊無實在效果，”這是半官報的大陸報上。

所沒有的。殊不知，假使“言論”過少，怎麼能够在袁世凱的“愛國儲金”之後，再來謊騙二千萬的“救國公債”呢？

（至於其他的詳詳略略的地方，自然還多得很，此地不必論列。）

（六）大晚報——“民族主義”的而又“文藝”的大晚報最漂亮，索性把蕭的談話完全取消，一字不登，關於“政府”和“革命”的談話當然首先在勾消之列。（而大晚報上却登了一篇“作為全上海中國報界的基調——基本腔調的”社論。關於這個“基本腔調”，請看另外一欄。）

再說一說關於李頓報告的問題罷，各報所載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字林西報——字林西報上的蕭伯納說：“李頓報告是沒有偏私的，而且是很能幹的寫出來的；”

（二）大陸報——大陸報上的蕭伯納，一個字也沒有提起。

（三）每日新聞——日文每日新聞上的蕭伯納，說：“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說明，是李頓的報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無學之輩，却太長；本國政府的官吏要細看牠，也太喫力。李頓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能說的，然而我想，再寫得簡潔一些，可就好了。我自己，

是只看了兩章，然而就是這一點，在我頭裏也還是太重的擔子；”

(四)上海日報——蕭伯納在日文上海日報上所說的話和在每日新聞上一樣，不過說得“簡潔一些”，不“太長”罷了。

(五)中國各報——蕭伯納在中國各報上大半沒有提起李頓報告，只在申報上說：“李頓報告書可稱公平，然以篇幅過長，恐無人能全部予以熟讀耳。”

(六)大晚報——蕭伯納在大晚報上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談話。

這樣，單在這兩個問題上，蕭伯納就做了各種政治立場的凹凸鏡：——日本要說中國並無中央政府，彷彿蕭就說了“中國政府不只一個；”英國要說中國政府只聽美國玩弄，不能盡如大英之意，於是蕭說中國民衆不要戲子做政府的話，就記載出來了；國民政府要說自己是很好的統治者，於是蕭說的話又變了：“好的統治者在民衆之中永久沒有好的名聲；”自由主義的幻想家要請政府少說些話多做些“改良的”實際工作，於是蕭的說話裏，彷彿又加了一句，居然也有些責備中國政府多講空話難於騙人的意思。而蕭對於李頓報告的批評，也是“因報而異”，簡直“一氣

化三清”，同時當了倫敦東京南京三個政府的外交總長了。固然，蕭自己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而日本報的記者最僥倖，他們完全沒有見着蕭，而居然“親自”聽見了蕭罵紅軍“簡直是土匪”的話。

總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蕭伯納變成凹凸鏡，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壯”，“圓轉”，而把別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實，他們各自現了原形：是戲子的還是戲子，是畜生的還是畜生，是強盜的還是強盜。那有什麼法子呢？

“比較翻譯學”完了——這只有政治上的說明，沒有文法上的解釋，抱歉得很，因為這凹凸鏡的文法實在太艱深，小子謹謝不敏：請問，譬如“Chinese people should organise themselves, and choose for their rulers not an actor of a feudal Baron”這麼一句，怎麼會一變變成了“a good ruler..... in nine out of ten cases is not a good actor and does not know how to please the people”?? 哈哈！

最後，這篇文章還要綴上一條“小辮子”——就是新聞紙上的小標題的“科學研究”。

中國各報關於蕭的記載，大概是同一樣的稿子，不過有詳略的不同，但是各報上各自添上了自己的小標題，於

是蕭的談話上就同時綴上了各種各式的“小辯子”：

(一)蕭接見記者發表警關妙論，謂英國對華根本並無政策(申)

(二)諷刺家所發議論輕鬆幽默，取旁觀態度博人一笑者也(時)

(三)孫夫人等前往歡迎，蕭見記者頗多妙論(時事新報)

(四)世界殊途同歸必實現社會主義(商報)

(五)蕭對於革命理想的智識只是浮光掠影而已，但是突然停止了他的鼓吹革命(大陸)

(六)訪問 Adelphi 賢人…沒有理想！(字林)

好了。這還用得着“科學的研究”嗎？各人的態度，各人的私心，往往在幾個字之中流露出來，——雖然古代有句成語說：“人生着舌頭不是爲着說出自己的心思的，而是爲着掩蓋自己的心思的。”

〔附錄一〕

二月十八日，日文“上海日報”——

在上海一時失了踪跡，給新聞記者莫名其妙的伯納·蕭翁，爲宋慶齡所同伴，訪問了各處的中國要人之後，至下午六時光景，在法租界莫利愛路的孫科氏邸內，落在記者團的警戒網裏了。美麗的白鬚，頰上泛着孩子一般的粉紅色，而滿口嘲弄，回答着記者的質問，揚起他一流的怪氣燄來。

記者：“爲什逃避着新聞記者的？”

蕭翁：“並不是逃避，因爲我不看新聞，所以沒有想到有新聞記者要來訪問的。”於是大言道：“我是和基督，梭格拉底一樣偉大的呵，假使諸君知道了我的本心，就不會給我活下去。

“關於我所說了的一切，是都保留着後來加以否定的權利的。”翁先行聲明之後，就吐出關於愛爾蘭問題的氣燄，接着是一串得意的共產主義的講解，道：“世界各國的反對共產主義，實在是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亞美利加，就是這樣的國度。亞美利加是壓制的，沒有什

麼國民的自由之類，簡直和奴隸沒有兩樣。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這東西，好像很弄錯了似的，掠奪東西，壓迫國民的所謂共產軍，那簡直是土匪。共產主義者，並不是拋炸彈，在安全地帶撒傳單，被巡捕看見，給他毆打的人。真的共產主義者，是懷着一種一定的理想，由建設的方法，來改善本國的社會政治狀態的，所以即使是國王之下的忠實的臣民，也尚且可以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好像是對於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還不容易弄明白似的。”

講了一通之後，是嘲笑英國的對華政策：

“對於中國，英國是一點政策，一點知識也沒有。倘要說有，那就是英國知道中國要武器和彈藥。只要中國要買，中國有現錢，英國是總將這武器和彈藥來賣給中國的。

“在西洋人的眼前，說明了中國的情勢的惟一的東西，是李頓的報告書，很出色，很細緻的，但在我似的無教育者，却太長；本國政府的官員看起來，也好像很喪力。李頓是很能幹的，但再簡略一些，就好。老實說，我是只看了開頭的兩章，就很夠了。

“關於中國的事情，即使英國來說許多話，中國自己

先靠不住，別人的事，不是真實的幫忙也無從辦到嗎？”

接着問起中日問題，則他拒絕了發言，那理由是：“只要從中國安全地走出了一步去，就什麼都說，但在中國的時候，這問題是要用 no no 來推掉的。”這使中國記者苦笑起來，“東洋人是太有了所謂‘教養’，却太缺着常識，大學畢業生太多了。

“馬克思並不是大學出身，然而極好的組織者，實行家，”漫談沒有窮盡，這樣的來饒舌，記者這面却覺得無聊，就走散了。

[附錄二]

二月十八日，日文“上海每日新聞”——

“我是全不看新聞的，不知道竟在這麼苦心地尋覓我。”

“對於無論什麼問題，我是總不懷定見的，懷着的只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是人到七十，當然要達到的結論。”

“其實，英國是完全不識得中國的，倘說有些識得，那就是只識得中國需要多量的武器和彈藥。只要中國能付現，無論多少都賣，這就是立場呀。縱使你說些何謂中國，

現狀如何，但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惟一的說明，是李頓的報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無學之輩，却太長；本國政府的官吏要細看牠，也太喫力。李頓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說的，然而我想，再寫得簡潔一點，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兩章，然而就是這一點，在我的頭裏也還是太重的擔子。總之，即使在英國有着對華認識，便有非有對華政策不可的道理麼？英國的立場，就如一家的主人，看見了在偷客廳裏的銀器的偷兒的一樣。自己這裏正在爲難，能來趕掉別人頭上的蠅子麼？”

記者問：“可是聽說日本就要決計退出國聯了。”

蕭答：“可是日本好像還沒有發出宣戰布告呵，——但是，對於日華關係，却因爲還未遠離中國，不能夠保證此身的安全，所以不能詳論的，因爲便是我，也覺得 Upper cut 是痛的呀。只是倘使我說起來，則在東洋，所謂‘教養’這東西太多了，平凡的頭腦却太少，大學卒業生太多呵。可憐，一跨進大學，就自動的地成爲獸子，不懂得成羣前去了。馬克思並非大學卒業生，但作爲組織者，管理者，却是出色的人物。不，比什麼都好的，首先是在他乃是一個有着仕布爾喬亞的府邸，用不要工錢的管家婦的頭腦的好共產主義者。”

這時候，中國記者問：“對於中國政府的你的意見呢？”

“在中國，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幾個，你是指那一個呀？”

中國記者只得轉為左翼，另整姿勢，問道：“那麼，中國有什麼可以學學蘇聯的處所麼？”

“那是‘政治的構成’那樣的東西罷。革命的訓練，與和巡捕打架的方法是兩樣的，但在俄國有革命博物館，是聚集着先前的革命家的遺物的，一看那樣的東西，就深覺得史太林政見的革命的必要了。”

於是將談鋒轉向蘇聯，發了一通共產主義論之後：“上海也像香港一樣，討人厭的，——是 gangs（狐羣狗黨）所造成的都會，我要回去了。”

此翁將同一的屁股，向了上海和記者團，走掉了。

Ⅲ 蕭伯納的真話

香港·上海·北平

蕭伯納的真話

[香港]

蕭伯納對路透社訪員說：“你很不像中國人”，“中國報界裏的人難道幼稚到連我也不認識嗎？”

“長城對於中國有什麼用處呢？”

“日本不向中國宣戰，這一點真所謂行得其宜。”

“我是屬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人物。”

“各文化國現在應當研究俄國的憲法，俄國憲法之中有許多點被其他各國膜視了。”

“中國政府，我倒以為殊有興趣。”

——以上見二月十一日路透社香港電——

蕭伯納在香港大學對學生發言，勸學生研究革命書籍和“浸淫”共產主義，他說：“如果你們在二十歲的時候不做赤色的革命家，那麼，到五十歲就要變成不堪的殭屍；你們要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成赤色革命家，那在四十歲的時候，就不致於有落伍的機會。”

——以上路透社二月十四日香港電——

[上海]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衆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王公。”

——上海字林西報二月十八日（這一段是申報等所沒有的）。——

蕭在筆會裏說：“此刻演說，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在座諸君都是著作家，我來這裏演說，豈不是‘班門弄斧’；普通人都以為作家是神祕偉大的人物，現在諸位却都是曉得內幕的人，何必還要多說呢。”

蕭鑑賞了筆會送給他的“泥製戲裝鬼臉”（臉譜）之後

說：“戲裏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惡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面貌上辨別出來；但是我們人的面貌却大都相同，而內心不見得相像。”

蕭對上海新聞記者說：“中國和東方沒有什麼文化可說，因為文化的意義，照科學的解釋，是人的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的行爲，尤其是對於自然界的控制；在中國，除開鄉村的田地裏還可以找着少許文化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文化可說的了。中國現在又向西歐去搬運許多已經失掉效用而且遺害大衆的所謂文化。譬如說，議會的興起，本來是人民不要當時的政府，英國人民利用議會，先推倒了帝王的統治，後來又推翻了教堂的威權，但是，最後却沒有推倒資本的勢力，因為議會根本上是被資本所操縱的。又像英國的大學，幾乎把個人的自由思想，摧殘得乾乾淨淨，而用陳舊無用的老古董塞進學生的頭腦，使他們變成一定格式的人物；這種人物到什麼時候就做什麼事，在什麼環境就有什麼反應，都可以預料得到的。像這種西方文化，中國搬牠來有什麼益處！”

“我過香港的時候，曾經勸學生革命，但是不要誤會，

我並非勸學生到街上去打警察；當警察拿着棍子到場鎮壓的時候，最妥當的辦法就是逃避，而且要儘快的逃避，免得頭破血出，很不必和警察對抗，因為警察像強盜手裏的手鎗，我們碰到強盜的時候，決不願意和手鎗去對抗。但是，那些拿着鎗的人，還是應當打倒的，這必須要用組織和計畫，而不能夠蠻挺。就是工人爲着要求待遇的改良而罷工，結果也必定會凍餓，我用社會主義的立場(?)反對罷工；然而在現在的環境之中，這種罷工手段，有時候也不能夠不採取的。”

“蘇聯最近內部的現象，無論精神上物質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現；而這種有規模的進步，不但蘇聯自己能夠得到極好的利益，達到美滿的成功，就在其他各國也可以‘借鏡’，採取牠的長處而實行模倣牠。”

“社會主義，早晚必然要普遍實行於世界各國，雖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驟，在各個國家裏所採取的方式，也許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歸’，到最後的終點，始終還是要走上同一條道路，而達到同一個水平線。”

俄文報記者突然的對蕭說，“我離開俄國的時候，俄國境內的情形紊亂得不堪，沒有像你所稱贊的那麼好”；蕭就斷然的告訴他：“你所說的，還是你離開俄國的時候——一九二二年所看見的情形，不是現在的蘇聯的狀況。如果你現在回國去觀察一下，——假定你回國之後還能夠逃出來，——那你一定知道現在的情形是很好的了。”

“英國人之中沒有一個人認識中國，所以根本談不到什麼政策。李頓報告書可以算公平，但是，篇幅太多，恐怕沒有人能夠全部熟讀。”

(註)——下列的消息，可以做“李頓報告書可稱公平”之說的參

攷材料：

【二十日巴黎路透電】李頓勳爵今日在巴黎和平俱樂部作驚人演說。謂“日本恐俄國共產主義傳至朝鮮，且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爲之焦慮。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但日本不予之助，而竟擇用武力，欲在滿洲一手創懸緩衝圈。要知此徒增加其所欲防範之危險耳。”

“上海非常之惡劣。”

——以上見二月十八日申報——

•

“聽說你在某大學裏學習編劇的，這就奇怪極了。在課堂裏，從書本裏，你學到什麼沒有？編劇要從人生中去學習的；我自己編劇的時候，我先認清幾個人，把他們的行動言語，記錄下來，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發展着，像一朵花的開放一樣，那真正可以學得會的編劇。祇有那除了“編”之外就沒有什麼的劇本，那便像一種用鐵絲做的九連環，組織與解開的時候，誠然是複雜得有趣，但是一點沒有意義的。想要學習作劇的人，最應當避免的，是先定了一個格局，一個程式，而陸續把原料填進去，到後來，你會注全力於格局與方式，而把你所以要寫這部戲的原故忘掉了。”（昨日下午兩點半從孫宅到世界學院的途中一段談話） 洪深記

——見二月十八日時事新聞——

•

上海記者問蕭伯納對於中國的意見。

蕭：“問我這句話有什麼用——到處人家問我對於中國的印象，對於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麼意見與

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聽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

——見三月一日論叢第十二期——

[北平]

•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了和平之累；日本過於愛打仗，也一定要喫打仗的虧。”

•

“滿洲三千萬的中國人，必須成爲愛爾蘭式的革命黨，就是要使得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由一個拿着來福槍的日本兵來監視他，這樣的事當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見二月廿一日申報北平專電和路透社電——

V 蕭伯納及其批評

“蕭伯納”

黃河清

蕭伯納是丑角

德國謝特甫格

蕭伯納

黃河清

在一個月前喧傳英國最偉大的諷刺家兼戲劇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行將來華，這消息好像他的辛辣的作品一樣的，立刻給我們以一大刺激。這位七十七歲的老作家，前年曾至蘇俄遊歷，考察其五年計劃的成就，而今正當日本積極侵略吾東北之際，又起興來華，不知他看到了中國社會之昏迷狀態，將作何感想！

這位老翁，本是不易瞭解的，乞斯頓 (Ochesterton) 在蕭伯納評傳中劈頭就說英國人不瞭解蕭伯納，而況我們遠在東方的中國人，當然更其不易瞭解他。雖則在五四運動以後，隨着易卜生的劇本，國人也曾翻譯過他的幾本劇本，但至今還沒有正確地介紹他的思想與作品的人，我希望他的來華，正如他藉此更明確地認識中國一樣，我們也得由此而更熟識他。

蕭伯納的一生是很多曲折的，他在未寫劇本之前，曾度過都柏林的學徒生活，曼徹斯特的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倫敦的著作生活，這種生活看似平凡，實則和他後來的作

品有很重要的關係。我在這短文裏，僅把他爲戲劇家之前後的生活思想略加說明，因爲我想這或許正是人家所忽視的一點。

蕭伯納在回顧過去的生活時這樣說：

“我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市外，在那裏過着十七世紀似的生活，所不同的就是那邊有煤氣燈與戴高帽子的警官肥了。在兒童時期，文學與音樂把我介紹到十八世紀。自後我的生活又進了一步。最後我便渡過海峽，來到倫敦靜靜地向時代的前面進行——向易卜生、尼采、費邊社與我自身的著作時代的前面進行。”

蕭伯納自都柏林投入倫敦，是一八七六年他二十歲的時候。那時候他對於自己的運命還沒有把握。他的父親是個中產階級的生活失敗者，他的母親是個自由思想的非家庭的婦人，他就在放任意慢之中生長起來，既沒有受過正當的教育，也不知認真的信仰；而因家境貧困，自十五歲起就不得不自謀生活。他從這樣困苦的生活中漸漸地把握着社會意識，而自己表現的本能亦由此逐漸得以發展。

他到倫敦以後，事情完全失敗，最初的六月差不多全在飢餓中挨過的。他自己曾這樣說過：“人生猶如戰爭一

般。爲要射死一個人，便不得不放千百顆子彈。”過後他當音樂批評記者、演劇批評記者，也曾寫過詩、做過小說。但是都沒有成功。最後爲劇本作家，乃由華倫夫人之職業一劇，一躍而爲劇壇重鎮，那正當他離開了故鄉十八年，即一八九三年，他三十七歲的時候。

那時候他自己已有一種獨特的思想。那是怎樣的思想呢？而這種思想是怎樣造成的呢？我們可以舉出直接給蕭伯納的思想以影響的先輩，如雪萊、易卜生、尼采、馬克思、瓦格納、莫差特、密刻倫修洛等。但是影響他最大的，却是馬克思的思想。蕭伯納實在是英國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一八八二年他聽了進步與貧乏的作者美國亨利喬治的演講後，受到極大的感化，對他全生涯造成了一個奇蹟。他既知道了經濟基礎的重要，就開始讀進步與貧乏，并出席社會民主聯盟的集會。接着他就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他曾經讀過達爾文的著作，而沒有變成達爾文派，但他一讀到馬克思的著作，便忽而成爲社會主義的信徒了。自一八八三至八四年，是蕭伯納最興奮的努力宣傳社會主義的時期。當時他讀到費邊社的一冊小冊子名多數人何以貧窮，他就決心和這班頗有教養的聰明人共同工作，遂加

入了費邊社，因此交識了許多同志，如有名的魏勃，摩利思等。

社會主義在蕭伯納是最高尙的東西，同時也是最尊貴的東西。乞斯頓在論到蕭伯納之爲社會主義者時，這樣說：“誰也知道社會主義的提案，是要將一切的財產應歸國家所有，而一切的財產也應平均地加以分配。而那提案，在理想上實是站在沒分辯餘地的二種主義之上的。即第一，人類可怕的不幸先直接地需要人類自身的援助，第二，這種援助應當是團體組織的。例如人民半數瀕於饑餓時，應予以工作與麵包。這是社會主義最有力的根本主張。而蕭伯納對於社會主義却是和他對於素食主義取着同一的態度。即他排除感情，以理性判斷一切。雖則理解蕭伯納的人，當然知道他對於壓迫窮人是處處抱着同胞似的悲憤的。”蕭伯納雖則同情於窮人，却把貧窮視爲罪惡，他在巴爾巴拉少校一劇中，很露骨地表現着他的貧富觀，說：

“貧乏使所有的都市腐敗，使可怕的疾病傳播起來，撲殺了見到聽到嗅到牠的人之魂靈。由此看來，說貧乏是“犯罪”是不成問題了。倫敦雖廣，真正的常犯也不過五十個光景；可是榮養不足的，穿着破爛衣服的污穢的貧民，真不知有幾百萬。他們毒害我們的

肉體與精神。他們破壞了社會的幸福。”

這種觀念也許是他那愛爾蘭的潔癖所造成的。愛爾蘭的超脫性與清教徒的峻嚴性，對於他所仕奉的主義與國家，本予以非常好的影響。但是蕭伯納有個最大的短處，就是沒有民衆的感情，就是現在也還是這樣。實際上，這種民衆的感情不論在他的人道主義中，社會主義中，都是找不到的。因此這費邊社的新洗練過的信念，反使這位愛爾蘭人變成更貴族的，使這清教徒變成更排外的。

自一八八三至八八年，蕭伯納還在當新聞記者，先作新書批評，繼之擔任美術批評欄，但都是堅苦的工作。而這時候他在過社會主義者的生活，藝術的表現不過是餘技而已。他自青年時代以至現在白髮的老年，不曾過過一次文人生活，年輕時雖曾出席過文學的研究會，但從沒有加入文士集團。他曾以此自誇，他說他一身雖幹過許多雜事，但決不像許多文人樣，以甜蜜的藝術的菓子養身，過夢想的生活。總之他的生活是在藝術中求實行，在實行中求藝術，而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話，在他看來簡直是一種夢話；生活的藝術，人道的藝術，除此以外，藝術在他是沒有用的。尤其是年輕時這種傾向非常強，因此他覺得站在講壇上作一個社會問題的論客實在比寫美術與新書的批評，要

有趣的多。

但至八八年當了音樂記者之後，社會主義的演說祇限於在星期日，握筆的機會便多了。他在孩童時，曾在音樂的空氣中過活，並會彈鋼琴，所以他對於音樂頗有自信，這工作他繼續到九四年。這時期他有了機會研究瓦格納。乞斯頓曾說：“蕭伯納很欽服音樂家瓦格納。那是因為瓦格納是不是用言語說話的。瓦格納若使不是一個音樂家而是一個普通人，恐怕蕭伯納便要和他起爭論了。”蕭伯納之為音樂批評家，完全是個“瓦格納黨”，他對於瓦格納的音樂中之革命的音聲，不惜加以精到且痛烈的贊辭。他對於莫差特、貝多芬、孟特爾遜也發表了真摯的鑑賞。

自九四年至九八年，他為禮拜六評論社之評劇記者，打破了遲鈍與諷刺的殘骸樣的十九世紀的沈默，使人聽到劇壇上真摯且激烈的戰論，他拿起了戰車與喇叭，決心以戰車為神聖的戰車，以喇叭為正義的喇叭，而顯示了為音樂記者以上的才能。他那時候所作的重要論文，都收在那兩卷題為戲曲論集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中。他的興味大半在於莎士比亞與易卜生，他讚揚後者，而賤貶前者，其理由是因為後者有思想，前者却缺乏思想。愛利薩朝的詩人惟有表現一項可貴，但其表現雖偉大，因思

想貧乏，所以不免空虛。據蕭伯納的意見，英國人並不是真能贊賞莎士比亞的人種，而只能做到相信莎士比亞的人種。即在英國人，莎士比亞是一個神明，是向之祈求的一種物體，實則蕭伯納之對莎士比亞挑戰的態度，還是愛爾蘭人的革命的態度，即追求真正嶄新的東西，憎惡壓制的態度，不，幾乎憎惡歷史的東西。乞斯頓在蕭伯納評傳中說有三大勢力給蕭伯納以極大的影響。而這三大影響便是蕭伯納自身是“愛爾蘭人”、“清教徒”、“進步主義者”。蕭伯納之誤解莎士比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清教徒，而莎士比亞在其精神上是天主教的。前者是自己突進去探求真理，後者只以口談真理為滿足。清教徒的長處，在其頑強之點，而天主教徒的長處，在其寬大之點。蕭伯納似乎完全誤解了莎士比亞的厭世主義的文句，因為莎士比亞的厭世主義，惟有抱着一定的信念的人纔能有的，那是一種獨特的情調：一切都是虛榮，人生若塵埃，戀愛如灰燼。而蕭伯納却以為真摯的樂天的傾向，時常是悲劇的樂觀主義之最偉大者。他在反對莎士比亞的厭世主義論中，常有透徹的理路與可驚的卓見。

同時蕭伯納對於易卜生却推讚備至，他以為易卜生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用寫實的手法寫近代人對於知的精神的

解放之苦悶，並對這偽善的俗惡的時代之機械的道德，表示反抗。蕭伯納又說易卜生不是藝術家，而是道德家，同時他的戲曲是含有教訓的，而偉大的藝術都是教訓的，在易卜生，這種特長特別濃厚，且不限於易卜生，所有優秀的戲劇家之作品中，都有說教的部分與普通的精神。蕭伯納的這種論調，無異給他自己的劇本以一個肯定的解釋。他在一八九一年出版一本易卜生主義之精華（*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這書可說是蕭伯納的道德觀之精華，同時是易卜生主義的宣傳書。

* 蕭伯納既自覺到天才，遂用心鍛鍊自己的思想，並研究其表現思想的方法。後來於一八九八年就辭去了劇評記者，專事劇本。他的三篇不快意的劇本（*Plays Unpleasant*）即寡婦之家（*Widow's House*, 1893）、調情者（*The Philanderer*, 1898）及華倫夫人之職業（*Mrs. Warrons Profession*, 1899）與四篇快意的劇本（*Plays Pleasant*）即武器與人（*Arms and the Man*, 1898），加狄達（*Candida*, 1898）運命之人（*The Man of Destiny*, 1898）及你不能說（*You Never Can Tell*, 1898）出版後，立刻成名。人家只要讀到他的一篇劇本，便要順次的讀他全部的作品，一看過他的一篇劇本，就在等待看他的新戲。他的作品出版後，大

家都厭棄了別的作家而買他的書。而這七篇劇本中尤以華倫夫人的職業與加狄達為最成功，可是優秀的藝術品都不是有趣的東西，所以蕭伯納則把他的劇本分為快意的與不快意的二種，但這二篇都不是快意的作品。同時就真理都是不快意的這意義上說來，這二篇實在可以說是不快意的作品。但是我們應得注意：這二篇却是作者的典型的佳作，與表現根本的恐怖的作品。

過後他幾乎每年都有新劇本上演與出版，其最著名的如惡魔的弟子 (The Devils Disciple, 1901)，愷撒與克利奧特刺 (Caesar and Cleopatra, 1901) 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1903)，醫生的難關 (The Doctors Dilemma, 1911)，結婚 (Getting Married, 1911)，歸於麥條舍厄爾 (Back to Methuselah, 1921)，聖佐安 (Saint Joan, 1923)。他的劇本即是他的批評。他以銳智的洞察力，觀察解剖且暴露現代生活之極底，要把社會從沈滯腐敗之中解救出來，而以機智、辣語、諷刺來刺戟羣衆，使之自覺。

他又排斥自希臘以來的使喜劇與悲劇對立的習慣，放棄由人生與運命的關係而區別悲劇與喜劇的想法，他由他一貫的思想，將增強生命之力的稱為喜劇，反之則稱為悲劇而加以排斥。他自覺為喜劇作家是他的光榮。而他所寫

的劇本，都是由這見解出發的人生觀照，文明批判。

——“社會與教育”——第一一六期。

蕭伯勒是丑角

德國尉特甫格作

劉大杰譯

英國劇作家同論說家的蕭伯勒，並不是革命的馬克司主義者。他是華賓協會 (Fabian Society) 的創設者，並且也是這個協會的一個永久的會員。這個協會的名稱，是借用一個羅馬貴族的姓，這個貴族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是用他的先見得到成功的。到了近來，蕭伯勒反了共產主義的革命手段，因為他覺得共產主義的戰術是錯誤的。馬克司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實際運動，在蕭伯勒看來，都是沒有用處。青年時代，他曾是馬克司主義的信徒，不過這是很早的事了。現在因為他對於馬克司理論的混亂的思想，使得他亂口攻讐了。

正如其他一切的社會改革家一樣，蕭伯勒也叫他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是那一類的社會主義者呢？在他的長篇戲曲“Back to Methuselah”裏面，這位作家所

介紹出來的社會主義者，是擁護着所謂社會主義者的信條。但是，這位人物，他是墨守着有產社會的舊式的美風和因襲的。據他的意見，有產社會，或許是有一種勢利的格調，缺少愉快。但是，至少比完全沒有格調的好。有產社會的體面，或許是虛偽的，但是這種體面，總還是存在的。這就是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正直的社會主義。

不用說，這只是英國作家的政治藝術的人格的一面。在他另外的許多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另一方面。蕭伯勒畢竟是一個有產階級的最後者。他承認資本家社會的崩潰，同時並是促進這種崩潰的。正如是文藝的意味一樣，這也是政治的意味。

俄國的列寧，很知道蕭伯勒他們的華資協會的傾向。他描畫出來這位英國人——不如說是英國的愛爾蘭人——是一個旁面包圍了許多偽君子的正直者，是一個比起周圍的人們來，要左傾得多的改革家。其實，沒有一個社會改革家，能够像蕭伯勒那樣的知道有產社會的缺點，能够像他那樣暴露這種缺點的。現代資本家的世界，同外面結合着種種的關係，蕭伯勒已經看出了那種革命的傾向，並且他認為資產階級的文化與理想，是毫無意義的。資產社會的唯一的真實，就是“虛偽”。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以前

是很強的，現在是衰弱是搖動了。這種觀念形態，必然的要被廢棄，這種空虛，也是一定要暴露的了。蕭伯勒是我們這個時代資產社會的理想的、最堅強的破壞者。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許多喜劇裏，他從各方面，打毀了資產社會理想家的結構了。

在“人與超人”裏，那位年青的理想家，看見他自己的汽車夫，一面流着汗一面在修理車子的時候，他對汽車夫說：“我是極端相信勞動者的尊嚴的。”他這句話，對於那位汽車夫，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他只冷然地回答：

“那這是因為你自己不勞動的原故，魯兵生先生；我的事業，只想做得同勞動離開就好了。”

被資本主義表彰的勞動的尊嚴，蕭伯勒是不尊重的，同時他也不尊重資產社會的尊嚴。他覺得資產社會，只是一個被保護的盜賊。在“人與超人”裏，那個西班牙的強盜的頭目，名叫蒙多沙的，對那個英國的富豪達勒這麼說：

“讓我來介紹我自己。我是蒙多沙，西爾拿聯盟的首領。我是一個山賊。我是依賴劫掠富人的銀錢而生活的。”

達勒聽了他的話，立即回答說：

“我是一個紳士，我是剝削窮人為生的。握握手罷。”

所謂資產社會的本質，真是亮光光地照出了。但是那

個紳士不僅是一個強盜，並且還是一個偽善者，是一個懷疑的動物。在“加奢林女王”那本劇裏，愛特司達頓說：“我有紳士的懷疑性”。他那位同伴的俄國紳士，並不懂得他這句話的意義。他說：

“在俄國，一個紳士是沒有懷疑的。我們都是正面地察看事實。”

愛特司達頓聽了，便回答說：

“先生：在我們英國，如果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實，我們是從不正面觀察的。”

依照這種理論，蕭伯勒自己並不是一個紳士。他時常被批評，說他對於資產社會的不愉快的事實，是很依戀的，這個社會，是將一切的事物，都弄成商品化，於是事物的真實的意義，也都變成歪曲了。就拿醫生作例罷。在資本主義之下，他們用最高的可能的價錢，賣去他們的最大價值的技術了。對於這個問題，蕭伯勒這麼說：

“我敲斷了腳，我必得想到那裏有一個外科醫生的難問題。比起你利用你的腳來，我不得更利用那一袋子洋錢嗎？一隻腳的人，就不能同兩隻腳的人一樣著作嗎？（或許一隻腳的比兩隻腳的還要好些。）但是，在這個年頭兒，錢對於我是大不相同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腳可

以生毒，用手術老是安全的，兩個禮拜就沒有事了。現在，橡皮腳，真是要比天生的腳好得多。進化是向汽車和沒有腳的方面進行的。”

這種資本家社會的根底的分裂，正如蕭伯勒所指示的，到了這種醫業的社會化。到那個時候，所謂醫業，一定要變到他的本意的正反面，成爲一種“以人間的信任與人間的苦惱作爲根底的陰謀。”

只要他有勇氣，任何一個貧乏的人，可以負起這種資產文化的虛飾。關於這一點，蕭伯勒在他的“配克馬利昂”五幕劇及其他的作品裏，已經向我們表示了。這一切是我們在他的作品裏可以讀到，在舞臺上可以看到的。蕭伯勒接觸到政治的意味，只有兩點。那便是宗教社會的任務，和權力的問題。這兩點，在他的救世軍戲曲“巴巴拿少校”裏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那本劇裏，作者將他的問題，達到一種革命的解決的途徑了。我們試看那劇裏的一段對話：

“安特震甫——你要知道。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是將他們自己賣給富人而生存的。

康循司——救世軍不是如此的。救世軍是貧窮人的教會。

安特霞甫——更可以買收。

康循司——我覺得你還不大知道，救世軍對於窮人有什麼用處。

安特霞甫——哦，我知道。救世軍只是拔去窮人們的牙齒，如實業家的我，只要知道這件事，也就够了。

康循司——胡說。救世軍是勸人戒酒的。

安特霞甫——那是更好了。他們會忍耐地做下去，不想改變他們的職業了。

康循司——要使他們安心。

安特霞甫——這對於革命，是最好的保護。

康循司——要使他們不自私。

安特霞甫——能够使他們不顧到自己的利益，那就好極了。

康循司——要使他們的思想，離開這個塵世。

安特霞甫——我最歡喜不飲酒的勞動者。那是利益更大了。

康循司——還教他們正直。

安特霞甫——正直的勞動者，最經濟。

康循司——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家庭要忠愛。

安特霞甫(站了起來)——你不教他們想想勞動聯盟和

社會主義。真是妙極了。”

.....

在這個劇的末尾，曾論到權力的問題。他覺得精神的力量是不夠的，同時必得需要的物質的力量。關於這一點，康循司教授又這麼說：

“康循司——做着希臘語的教師，我曾給過知識階級一種武器，去對抗民衆。現在，我要給民衆一種武器，去對抗知識階級了。我愛民衆。我要給他們武裝，好去對抗律師醫生牧師文學家大學教授美術家和政治家。這些人一旦得了勢，就是在蠢人惡漢和騙子之中，他們是最危險最險惡最專橫的徒輩了。我的希望，是要有堅強的民衆，強迫着民衆，強迫着少數的獨裁的知識階級，將那種天賦的才能，用於全社會的利益；否則，就鬧得全部崩潰。

巴巴拿——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力量了。（指着那個砲彈）

康循司——是的。但是，這種力正如一隻猛虎可以咬死一個人一樣，牠是能破壞高等的力量的。因此，人間第一要控制這種力量。關於這個，當希臘同土耳其打仗的時候，我就承認了。我的頂好的學生，因為希臘而挺身到戰場去了。我送他的禮物，並不是一冊柏拉圖著的“共和國”

而是一支手鎗，一百顆安特霞甫公司的子彈。被他擊斃的土耳其的每一個人的血——如果他能擊中的話——正如擊在安特霞甫的頭上一樣，也擊在我的頭上。”

• • •

一切的社會主義平和論者，對於蕭伯勒說的這些話，是要注意的。請那些相信用精神的力量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的人們，把這種教訓，寫在他們的信仰的書本裏罷。

有許多人老是這麼問，這位先生為什麼那麼溺愛着有產社會，為什麼對資產階級的劇場，寫了那麼多的劇本，那麼爽直地陳述着真理呢？我可以回答，蕭伯勒是一個喜劇的作家。因此他能夠說出許多輕視因襲的滑稽話。他很像沙士比亞舞臺上的丑角。這與卓別麟的社會諷刺，是同樣的。在卓別麟蕭伯勒的傑作中那種破壞的反資產社會的效果，並沒有人注意到。

現在，要做一個結論了。蕭伯勒在資產社會的文化的最後階段，是一假沙士比亞的丑角。但是，正如列寧所說，資產社會與蕭伯勒的關係，比起革命與蕭氏的關係，完全是兩樣的。我們可以把列寧這句話，更具體化地說出來：“蕭伯勒是資產社會的一部，但是，他是資產社會的可怕的敵人。他的對於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的破壞，衰弱了支

配階級的精神權威。”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是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

此文爲德國馬克司學者尉特甫格 (Karl August Wittfogel) 原作，登於柏林出版的 “Die Rote Fahne” 報紙上；後被英人譯出，刊登於 “The Living” 雜誌。我現在是從英文轉譯的。

譯者附記。

——“海潮”二十一期。

一九三三年三月印成

“蕭伯納在上海”

(不許翻印)

每本實價

大洋五角

上海野草書屋發行

“文藝連叢”

出版預告

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爲文藝盡力的人。三開書屋曾經想來抵抗這頹運，而出了三本書，也就倒籠了。我們只是幾個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來試一試，看看中國的出版界是否永是這麼沒出息。

我們首先要印一種關於文學和美術的小叢書，就是“文藝連叢”。爲什麼“小”，這是能力的關係，現在沒有法子想。但約定的編輯，是真的肯負責任的編輯，他決不只掛一個空名，連稿子也不看。因此所收的稿子，也就是切實的翻譯者的稿子，稿費自然也是要的，但決不是專爲了稿費的翻譯。總之：對於讀者，也是一種決不欺騙的小叢書。

現在已經付印的是：

1.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蘇聯蕭維洛夫作，
曹靖華譯。 作

者是一個最偉大的農民作家，可惜在十年前就死掉了。這一篇中篇小說，所敘的是革命開初，頭腦單純的革命者在鄉村裏怎樣受農民的反對而失敗，寫得十分生動。譯

者深通俄國文字，又在列寧格拉的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學有年，所以難解的土話，都可以隨時詢問，其譯文的可靠，是早為讀書界所深悉的。內有講支(Ez)的插畫五幅。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2. 山民牧唱。

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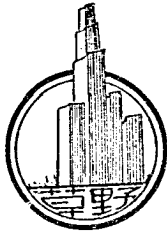
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因歐洲大戰時候，作書攻擊德國的伊本納茲，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日本譯有選集一冊，所記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風俗習慣，譯者曾選譯數篇登“奔流”上，頗為讀者所贊許。這是選集的全譯。上有作者畫像一幅。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3. Noa Noa.

法國戈庚作，羅懋譯。作者是

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名還未一定，或者就可以改為“泰息諦紀行”罷。裏面所寫的就是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却並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現已付印。

上海 野草書屋 謹啓



\$. 50